

---

# REMEMBRANCE

#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Irregular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

# 《记忆》268 期

## 北京高校文革专辑（32）

### 目录

#### 【专稿】

吴根耀 《师劫》：一部可圈可点的力作

#### 【人物】

樊能廷 北大文革“老佛爷”聂元梓（节选二）

#### 【争鸣】

樊能廷 聂元梓的手伸到华北局

王复兴 简评樊能廷的《聂元梓的手伸向华北局》

#### 【述往】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  
——工宣队与大联合（21）

#### 【文摘】

老 田 教科书一般的人生经历——评聂元梓

#### 【资料】

杨 勋 北大文化革命又处在关键时刻（1966 年 10 月 6 日）

——兼评聂元梓同志八月五日的广播讲话

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哲《风雷激》战斗队

要彻底革命，不要改良派（1966 年 10 月 12 日）

#### 【本刊声明】

## 《师劫》：一部可圈可点的力作

吴根耀

笔者曾把文（化）革（命）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革学的兴起，特点是“文革在中国发生，文革学在美国兴起”。第二阶段始自1988年，中国人成为文革研究的主体，并出现了一支相对年轻的研究队伍。2000年起进入第三阶段，是文革研究的高潮时期。<sup>1</sup>现笔者斗胆预言：2019年起文革研究进入第四阶段。

### 第四阶段文革研究的特点

第三阶段的文革研究以“全民卷入”为明显特征。一是原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包括高层领导和文革新贵），尽管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辩白和开脱罪责，却道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革内幕。二是消息灵通人士如首长秘书警卫和记者等，披露了大量令人惊讶不已的消息。三是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受难者，用亲身经历控诉了文革的罪恶，是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主要原因。四是出现了一批研究论著，颇多有见地者，也不乏暗流逆流之作。此外，还有半经历者（当年的小学生）和非亲历者（1970年后出生）加入文革回忆和研究的行列。这一阶段文革研究的热潮席卷全球，故著作题材多样，体裁各异，文风当然也“百花齐放”。从年龄看，则是米寿白寿的翁妪与未届不惑的小辈并肩在同一战壕。

2019年开始，上述局面随文革研究开拓者的老去而告结束。第四阶段文革研究的特点，一是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全民卷入”式的文革研究，转为文革重灾区单位的深耕细作；二是撰文者以当年的“老五届”大学生为主，现都已跨入古稀之年。从写作者的情绪看，泄愤发牢骚的阶段已经结束，大家都尽量冷静而理性地回忆事实，总结教训。

这一阶段的文革研究有两种思路，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研究著作。

第一种风格的研究著作以2019年1月出版的《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

<sup>1</sup> 吴根耀：《50年后重新话文革》 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8。

---

院往事记述》和《北大文革简史（1966.6-1969.6）》为代表。前者是集体创作，后者由樊能廷一人完成，据告都是120万字的篇幅。全书由几个板块组成，包括总论/专题，人物/事件，过程考证/史料辑录等方面。这类著作的优点，是为本单位留下了一套相对全面而完整的文革资料，便于后人查阅和使用。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篇幅太大，恐怕仅有从事该单位文革研究的学者才会去细心揣摩，本单位的人都未必有耐心慢慢读完，这大大影响了成果的宣传和影响的扩大。书中难免有前后矛盾之处，让读者无所适从。

另一种研究思路是抓住本单位文革的主要特点，即抓住文革中的关键人物，辅以特征事件的叙述和剖析，用小于60万字的篇幅，简明扼要地描述本单位的文革脉络，让读者得到一个概貌性但却印象深刻的了解。这会大大提高作品的可读性，从而有助于扩大著作的影响。2019年1月出版的《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可称第二种风格的代表作。

在第三阶段中已出版了多部以某单位文革中的特点为题材的研究著作。成功的实例，如北京大学郝斌的《流水何曾洗是非》，记述了亲身经历的文革期间北大的“牛棚”；重庆大学周孜仁的《一个红卫兵小报主编的文革记忆》，主要描写了重大派斗和武斗的惨烈。这两本书中的“主角”都是事件，尽管反映了该单位文革一个特征的故也是重要的侧面，但读后尚不能对该单位文革的全貌和全过程得出大概的认识。第四阶段文革研究的明显特点，是以该单位文革中的关键人物为主线来编排文革资料（尤其是特征事件），以凸显出本单位文革的主要脉络。这就“更上一层楼”了，因为不仅需要写作技巧，更需要政治智慧。

### 北师大文革的关键人物

北师大文革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当数林杰。他是北师大文革的“保姆”，实际的领导人；谭厚兰只是他牵线操控的一个木偶。

1966年6月1日之前，康生通过其妻曹轶欧及时了解北大“社教”后的各种动态；6月1日后他和江青都去北大看过大字报。7月25-26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大主持召开辩论会，以“绊脚石”为由赶走了工作组，江青亲自点名由聂元梓筹建北大的校文革（“文化革命委员会”）。7月27日，中央文革大驾光临北师大。康生说：“林杰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这是个好学生，你们

的一个好同学！还有人说‘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还有个后台老板是我呢！”

这与昨晚在北大发生的一幕何其相似：聂元梓成了江青封的“帅”，林杰则是康生点的“将”。事实明摆着：北京高校文革两派的后台实际上都是中央文革（尤其是康生和江青）。这句话的另一种表达是：北京高校文革期间的两派及其斗争是中央文革的“杰作”。中央文革的第一步是以“树典型”的手段制造了几个“山头”。第二步是怂恿他们去夺权；为争权夺利，“山头”不但要扩充势力，而且分化为泾渭分明的两派。其第三步是播弄是非，今天支持这派指责那派有“坏人”，明天又支持那派批判这派干“坏事”，搞得两派水火不容、势不两立。聂元梓却一口咬定“地派的后台是王关戚”，不但“忘了”自己的后台是康生，反而把自己吹嘘成“反王关戚的英雄”，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北京高校分为“天”、“地”两派，聂元梓一直坚持叫“北大派”和“（北）师大派”。客观地讲，聂所说在理。本来，聂是要争当“天派”的“派头”，却无意中宣泄了她“既生瑜何生亮”的悲鸣和无奈：既然中央文革树了我这个典型，为什么还要再去树另外一个典型呢？康生回答得很清楚：聂元梓是个王八蛋现在也得支持，因为她打了第一枪。所以，必须还要树一、两个“非王八蛋”典型，首选是谭厚兰：北师大文革的另一个关键人物。

我在67年春以后是“逍遥派”，对谭厚兰、王大宾和韩爱晶一无所知。对谭的唯一了解，是在边吃饭边看大字报时记住的两句批语。一句是：谭厚兰，你的脸皮有几“谭”厚？另一句是对“谭厚兰，你要脸不要？”的批语：要脸干什么？要毛泽东思想！对王大宾，则连这样的记忆都没有，故前几年读《王大宾回忆录》，一个强烈的感觉是似乎写得有点“窝囊”：你毕竟还是“五大领袖”之一嘛！

读完《师劫》，看到了一个清晰的“谭厚兰”：言辞木讷，缺乏判断能力，但根红苗正，老实听话。假设今天谭厚兰自己写一本文革回忆录，只怕读起来会比《王大宾回忆录》更感到“窝囊”。这两位清楚地说明了中央文革要树的“非王八蛋”典型的标准：不讲能力讲忠诚。正是因为能力平平，才便于中央文革操控摆布，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

北师大文革的关键人物之三是“井冈山造反兵团”，是谭厚兰“井冈山公社”的对立面。尽管“造反兵团”顶了个“井冈山”的名，却是“反谭”的，属笔者

---

所称的反文革新贵的第三代造反派（第一代是造原校党委反的造反派，如聂元梓、谭厚兰；第二代是造工作组反的造反派，如蒯大富）。《师劫》中有专文介绍“造反兵团”简史，并有章节对其作历史评价。恕笔者直言，这部分遗漏了一个大问题：对“七二八”召见“五大学生运动领袖”时毛泽东称“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这个结论竟然无动于衷。

按《师劫》所言，“造反兵团”是个200人的组织且仅限于校内，那就称不上“大杂烩”；在1967年的“九七”事件中表现得十分冷静和策略，在1968年初的高校大联合学习班上被谭厚兰赶出会场，似乎是个“温和造反派”，怎么能与湖南“省无联”并论？后者是个政党式的群众组织，有杨西光这样的“理论家”提出相对明确的建国的政治纲领。“造反兵团”里有杨西光这样的人物吗？只有“造反兵团”自己来回答了。

“七二八”召见，毛要通过“五大领袖”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不仅要迅速结束北京高校的武斗，而且要迅速制止全国各地的武斗，让天下达致“大治”。耐人寻味的是：他在召见中对“五大领袖”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对校园中的对立面组织也有不同的表态。对北大，他反复强调不要“宰牛（牛辉林）杀猴（侯汉清）断羊腰（杨克明）”；对清华，他明确表示“不喜欢那个四一四”。毛对北师大“造反兵团”却作了一个很严重的定性（比“保皇派”严重多了）。这个结论怎么得来的，是否蕴含着下一个“伟大战略部署”的什么信息等等，不是很值得严谨考证和深入研究吗？毛批评清华“四一四”（一个温和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受到了“四一四”负责人的普遍抵制。“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的作者周泉缨咽不下这口气，竟然弃工从文，终生都去研究哲学了。笔者愚见：要真正对“造反兵团”作出历史评价，必须直面这一结论，用事实做出回应，没准能将北师大的文革研究推进一步呢！

### 北师大文革的特征事件

北京高校文革中发生的事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若干个（同一派）学校联合发动和举行的；北师大作为“地派”的头，当然起了牵头和组织的作用，如以“打倒谭震林”为标志的反击“二月逆流”，批判“工业学大庆展览”和“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等等。另一类则是仅在北师大发生的、可作为该校文革特征的

事件，如1966年11-12月的山东曲阜“讨孔”，1967年的“九七”事件和1971年的“四二六”事件。

在1966年的红卫兵“破四旧”运动中，清华推倒“二校门”已属“出格”之举（北大校园主要是宫殿式建筑但保存完好，北大学生还保护了“岳阳楼”等古迹）。谭厚兰本人也选择以教师为职业，却对“至圣先师”（通俗的说法叫“老祖宗”）下如此毒手，真是匪夷所思。《历史岂能忘却？——记谭厚兰的滔天罪行之一“曲阜讨孔”》一文，介绍了事件的来龙去脉，重点突出，数字详实，图文并茂，是一篇可圈可点的好文章。

北师大“九七”事件牵动了北京的许多高校。在《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中，对“九七”事件的全过程有详细记载，但没有专文详细剖析其背景，揭示其内幕，是一不足之处。王力、关锋8月底“隔离审查”，“倒谭”事件晚了一个星期发生，为什么？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中央高层对“倒谭”的反映是如此迅速且强烈，可谓异乎寻常。如果对比1966年的“十二月黑风”和1968年春夏高校武斗的处理，对“倒谭”的处理确属空前绝后。

1966年12月，有人给林彪和中央文革贴大字报，史称“十二月黑风”，北师大是“风源”之一（《北师大的“12月黑风”与“修建科劳改队”》一文详述此事），但中央文革没有及时煞停此风。1967年1月上-中旬，中央党校、清华和北大有人反康生，至1月下旬江青和陈伯达才气急败坏地跳出来明确表态。北京高校1968年武斗，4月27日北大死1人，5月22日人大死3人，5月30日清华又死3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鲜血已溅到了中南海的墙上，但直至7月27日才派工人去清华制止武斗。“九七”事件则明显不同：上午是“天派”在北师大开“倒谭”大会（“打倒林杰，彻底摧毁5·16兵团誓师大会”），晚上形势翻转，“地派”来北师大游行声援谭厚兰。一天内进出北师大者，竟有十万之众！

处理“倒谭”事件，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亮出了三把宝剑：“‘中央文革’紧急通知”、“谢副总理转达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和“北京市革委会通告”。谭厚兰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面子？即使谭倒台，相信“地派”也绝不会土崩瓦解。之所以要这样大动干戈，据说是文革发动者的意思：事态“要不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康生语）。那么，制止“倒谭”的全国大背景和高层的领导背景，不是很值得下功夫大力研究的吗？

---

北师大的“十二月黑风”之前还有一件特征的事（称不上“事件”）：1966年10月17日李文博贴出“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的大字报。它“当时在北师大的反响不是最大，……在校外影响极大”（《师劫》P.54）。文化革命中，由于全民造反，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并催生出一股“异端”思潮。其第一篇文章是北大乔兼武和杜文革“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这“三个大反”是：“砸烂党团组织”、“政党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和“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不过，他们只是提出了“革命委员会”这个构思，对国家体制和国家机构等重大问题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这股思潮在演化进程中被不断地明确方向和具体化，至1968年3月杨西光完成其代表作“中国向何处去”，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纲领。

李文博在其大字报中提出“巴黎公社原则”，实际上首次提出了文革后的建国方向，成为这股“异端”思潮发展到新阶段的代表作。《师劫》中没有专文讨论这份大字报，《附录》中只有1页纸的“概要”，没有全文登载，感到有点遗憾。

### “序”的启示

说《师劫》一书可圈可点，首先是因为两个“序”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启之在《序一：信史，在民间不在府衙》中说：“校方编写的大事记，对十年浩劫，或遗漏，或曲解，甚至只字不提。《北京师范大学111年发展历史大事事件概记》，从1959跳到1978，1960至1977只字不提。这18年间千万人的苦难，近百人的死伤，学校的混乱，学业的荒废，煌煌校史置若罔闻”。这真是令人惊讶不已！

笔者曾指出：文革研究中的一个可怕倾向是“遗忘历史”，且“遗忘”的手段五花八门。其中一个手段叫“剪布式”遗忘，如《“中国梦”的历史解读》。<sup>1</sup>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传说中的“五帝”讲到1949年4月23日解放南京，第二部分从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到现在，跳过了两者之间的近30年！换言之，新中国最初近30年这一大段“布”——而且是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布”——就被无情地一刀“剪掉”了！

没想到作为中国师范教育最高学府的北师大，天经地义就该为人师表的学术

---

<sup>1</sup> 郑斯年：《“中国梦”的历史解读》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殿堂，竟然也这样“剪布式”地遗忘历史！也正因为此，《师劫》一书就尤其显得珍贵，并将随文革的被淡忘而显现其历史价值。北师大学子们的勇气和智慧正在成为后继者的楷模。

刘明的《序二：平民子女的愚忠、求索与苦难》堪称画龙点睛之笔。标题唤醒了我们这代人一个久违了的记忆：那时师范院校的学生免伙食费，吸引一代有志于学而家境贫寒的青年跨进“师范”的校门。他们一直深信是毛主席把他们送进大学，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一旦被卷入愚民的政治运动，必然表现出愚忠。文革发动者正是利用了广大平民子女的愚忠和少部分高干子女骨子里根深蒂固的“血统高贵”意识，在大学生中首先发动了文化革命。随文革“深入”，造神运动逐步推向高潮，平民子女的愚忠呈幕次升高（刘明语），在把国家推入灾难深渊时也使自己误入苦难之路。

在落实文革发动者这个构思的具体操作上，中央文革可谓煞费苦心。在树了北大和清华这两个高干子女成堆的大学为典型后，马不停蹄地要树两个平民子女大学的典型——北师大和北地院应“运”而生。后者的平民子女大部分来自山区和农村，更单纯和朴实，不用中央文革首长出面，去几个办事员（如李讷）即可发动起来。再加上一个军事院校北京航空学院，就组成了中央文革操控的杀上“造反”第一线的“五虎上将”。

在高校林立的大城市，杀上“造反”第一线的高校不乏这样的“五虎上将”组合。如西安，当时名噪一时的五大院校是：（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和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分别对应于北大、清华、北师大、北地和北航。西安的五大学生运动领袖，竟然也是三男两女组合，与北京像是一个铸模里倒出来的。高校相对较少的城市，杀上“造反”第一线的必然是当地最著名的学府和师范院校，反映的仍然是愚忠的平民子女和“高贵血统”的干部子女组合。中产子女占比例较高的医学院，是高校中“保守”势力的代表，无一例外。

### 也谈关键人物和特征事件

综上所述，《师劫》给人的启示是：抓住本单位文革运动的主要特点，或说抓住本单位文革中的关键人物和特征事件来研究其文革进程，总结文革教训，是

---

一条简捷明快的思路。这既易于读者了解该单位文革的脉络和概貌，也便于研究成果的宣传和推广。说句大白话，就是“可读性”强，尤其对老年人而言。

不过，在按这一思路进行具体研究时，会对本单位文革主要特征的认识和总结发生分歧；在当年的派性造成的思想隔阂和感情对立仍未消除的情况下，可能会有观点的重大分歧。以北大为例，扬子浪总结了北大文革的三大特点，一是“社教老左派文革打头阵”，二是“北大校文革变成稀有物种”，三是“北大革命师生最先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sup>1</sup>笔者对其第一点和第三点就大不以为然。

1964年开始的“社教”，在北大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北大在当时确是少数“试点”单位之一，但不是唯一的“试点”高校。如北师大，也曾开展过“社教”，只是不由中宣部派工作队罢了。更何况“社教”与“文革”是两码事，或说两个阶段，因为标志“社教”结束的国际饭店会议在1965年底已基本结束，即使哲学系的国际饭店会议结束得晚一点，至1966年1月也结束了。怎么能把“社教”当成北大文革的第一个特点？至于“文革打头阵”，即1966年5月-6月初反原单位党委的第一代造反派，其实远不止北大的“社教老左派”。他们都在《“五一六”通知》的号召下奋起造反，如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吴传启5月23日贴大字报，高教部的卢正义5月25日贴大字报，北师大的谭厚兰6月2日贴大字报。这说明不管有没有进行过“社教”，各单位里都有可称“老左派”的人。北大的特点，只是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受到宠幸而向全国广播了。

支持第三个特点的主要依据是陈伯达1967年6月5日对北大的严厉批评。不知道是疏漏还是为了强调“最先”而故意篡改，原文竟说成了“陈伯达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对聂元梓、孙蓬一作十分严厉的批评”。1966年6月5日是工作组领导北大文革的时候，孙蓬一那时似乎不在北大。陈伯达此时正在组织一篇又一篇的“重要”文章煽文革之风，点造反之火，怎么会跑到北大去对“聂元梓、孙蓬一作十分严厉的批评”？！为什么连这些最基本的、人所共知的事情都会弄错？这只能表明这位先生依然是“怀着派性情结，坚持派性思维”。笔者说过：“一旦被派性鬼迷了心窍的人，即使‘高材生’也会变得不近常情，不谙常理，不懂常识”<sup>2</sup>。这又是一个实例。

---

<sup>1</sup> 扬子浪：《北大“文革”的三大特点》，见：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页82-87。2019。

<sup>2</sup> 同上，页389。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到1967年6月才“变成”的，是文革发动者早就铁定了的结论（故在文革之前他就要开展“教育革命”）。在家喻户晓的“五七指示”里，他大声疾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6月1日，他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上的批语是“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那么，这个“反动堡垒”里怎么会有“革命师生”呢？很简单，那是中央文革的骗局：要你们去反对“陆平黑帮”、打倒“旧北京市委”和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当然要说些你们爱听的话来把你们煽动起来啊。不但要骗，还得把你们骗得团团转，所以，不但要称你们为“革命师生”，还要高呼向你们“致敬”，含着眼泪喊你们“万岁”并与你们拥抱。50多年了，还识不破这个骗局吗？当然，你可以依然活在文革里，认为这不是骗局，别人无法强迫你改变认识。如这样，那就不要奢谈什么“文革特点”吧，免得贻笑大方、贻害无穷。

当然，这个实例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意见分歧是认识问题。这种情况下，最好能坐在一起互相讨论，尽量求大同存小异，并将不同认识反映在同一本书里。如能有一个师弟师妹们参加的协调组或策划组加以统筹，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 结束语

当初我读孙怒涛主编的《良知的拷问》（2013）和《历史拒绝遗忘》（2015）、了解清华的文革进程时，总爱与北大的文革进行对比。深深感到北大与清华是一对文革的“难兄难弟”，在文革中有不同的角色，却都是文革发动者的“铁拳”。今天读《师劫》，也爱与北大的文革对比，感到北大与北师大似乎是一对“孪生”姐妹：两者既互相依存，又此消彼长。作为“北大派”与“（北）师大派”的“派头”，这两校（派）是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两面。文革不仅使北京而且使神州大地乌云压城、腥风血雨，不就是中央文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结果吗？兼之北师大文革直接受林杰操控，某些方面确实走在北大之前。因此，了解北师大的文革对研究北大的文革可能带来更多、更深刻的启示。

老天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何况现在精力大不如从前，脑子也不“灵光”了。学习成功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对比研究，也许能让我们的余生发出更多的光热。有感于此，写了一点《师劫》一书的读后感，与有志于在深耕细作阶段把文革研究推向精细深入的师兄师姐们共勉。

---

蒙北师大赵惠中等先生提出批评指正意见，谨致衷心谢忱。



【评论】

## 北大文革“老佛爷”聂元梓（节选二）

樊能廷

### 文 革 篇

下面，大概按照时间顺序，讲讲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和活动。

1966年5月，聂元梓向康生当面（并且三次书写材料），诬告安子文、邓觉先、张振汉“特嫌”。这当中，聂元梓还错告了张仲瀚。张振汉、邓觉先双双冤死于狱中，到80年代先后平反。

1966年5月中旬，曹轶欧调查组在住地西颐宾馆，找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哲学系教师杨克明等人见面，谈有关“文化大革命”问题。曹轶欧几次策动老资格的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要他起来揭发陆平，没有策动成功。曹轶欧转而策动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这一下，策动成功了。

5月25日，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彖、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名党员签名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学校大饭厅东墙上贴出。

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赵正义是3月上旬任命的总支临时副书记，其他五人，一色的都是党员。

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把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把这份大字报稿直接送给当时在外地的毛泽东。康生要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让她“顶住”。其实，毛泽东对于这张大字报持一个什么态度，康生心中还没有底，心里也在打鼓。

6月1日，晚8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的大字报。播出后，全校震惊。

6月2日，首都各报全文发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则以《北大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发表这张大

字报，并配发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6月10日，张承先工作组领导小组会研究确定：办公室主任聂元梓，副主任杨克明。在《聂元梓回忆录》里，聂元梓矢口否认，说“后来公布的材料说，我曾经被任命为张承先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但是，我自己并不知晓此事，没有人通知过我就任，我也没有参与过工作组的工作，更不知道我这‘主任’的‘办公室’在哪里。”

7月19日，聂元梓在哲学系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究其实，风来树动，聂元梓讲话前，从康生那里了解到上边对文革工作组态度的变化。

晚11时，哲学系学生在大饭厅等处设立演讲台，传播聂元梓的讲话，批评工作组是保皇党。于是，在学生和教职工中围绕工作组问题展开了“大辩论”。有人要求改组工作组，罢张承先的官；还有人要求让聂元梓参加张承先工作组领导小组。

7月22日，江青、陈伯达等以调查文化革命的名义，来校看大字报，向师生发表讲话，并召开座谈会，又个别召见聂元梓等人，鼓动他们起来反工作组，赶工作组。

7月26日，晚7时半，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吴德等再次来北大，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李雪峰口头宣布撤销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江青点名要聂元梓出面筹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7月27日，聂元梓按照江青的授意，向全校提出“民主选举校文革筹委会”的倡议。聂元梓经过哲学系推选为代表。

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主持开会，确定筹委会由21人组成，并组成7人常委会。主任委员聂元梓，副主任委员白晨曦、聂孟民（学生），常委有牛皖平、徐运朴、廖淑明（均是学生）及戴新民。

8月1日，中央召开十一届一中全会，聂元梓、杨克明、张恩慈因“第一张

---

大字报”出笼而立功，奉命列席全会。

8月3日或4日，江青邀聂元梓坐江的车到她住处（钓鱼台）吃饭，江青说聂元梓等人写的那张大字报是她亲自送给毛主席的。江青向聂透露机密、攻击刘少奇。江青要聂元梓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我，我随时可以接见你”。聂事后认为：这是“表明她把我当做了她的嫡系和心腹，才对我透露最高机密。”【笔者注：跟江青同进饮食，确实很少有这样的“殊恩厚渥”见诸文字。江青是不是把聂“当做了她的嫡系和心腹”、是不是“透露最高机密”，难以判断是不是聂元梓的“自我感觉良好”。】

8月4日，康生、江青在全校大会上，对北大文革筹委会的成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聂元梓“致以革命的祝贺”。康生在会上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说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副组长张德华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六一八是革命事件”。张承先当场被冲上台的中学生彭小蒙用皮带抽打，并被批斗、坐喷气式。

康生在会上还说：“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和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也受到了压力”。康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

8月5日，聂元梓发表广播讲话，不久，受到杨勋的批评性评议。

8月10日，晨，聂元梓到曹轶欧家中，请示批斗陆平的方案。【笔者注：按照官场潜规则“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找了曹轶欧，就是找了康生，就是找了“组织”，就是找了政治保险、政治支持。5月25日大字报前，聂元梓找曹轶欧也是找政治保险、政治支持。】

8月13日，根据中共北京市委指示，并经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筹委会同意，北京市委驻北大工作组全体人员于今天撤离北大，集中到市委党校整训。

8月14日，康生办公室向聂元梓传达关于批斗陆平的“指示”：“斗争会要开好，对全国有影响，发言要以《十六条》为纲”。

8月15日，聂元梓校文革筹委会在工人体育场开十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学校负责干部彭珮云、张学书、谢道渊、王学珍等人被揪上台陪斗。被斗人和陪斗人一律挂黑牌。

8月19日，聂元梓召集发起、成立北大“红卫兵”组织大会。各系级、各单位“红卫兵”相继成立，并建立了校“红卫兵联络站”。

8月30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出席。聂元梓致开幕词。

1966年9月2日，校刊《新北大》第3期，第二版，刊登《聂元梓同志在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今天参加大会的还有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王任重同志，我们对他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向他致无产阶级的崇高的战斗的敬礼！

9月11日，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主任：聂元梓；副主任：孔繁、聂孟民、杨学祺、白晨曦。

9月13日，校刊《新北大》第6期（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专号），第一版转第二版，本刊九月十二日讯《我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文化革命委员会正式诞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建勋同志出席闭幕式并致贺词》：在今晚的闭幕式上，聂元梓同志致闭幕词，

9月21日，北大红卫兵统一工作委员会成立。聂元梓指定孙蓬一为负责人，聂元梓、孙蓬一百忙之中急于一统北大红卫兵。

9月30日，校刊《新北大》第12期，第三版，刊登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赵正义、高云鹏、杨克明、夏剑豸、李醒尘《无私才能无畏》，这是“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群的自我炫耀。

10月8日：校刊《新北大》刊发《欢呼这场大辩论》的社论。《新北大》刊登经济系教员杨勋的文章《新北大文化大革命又处于关键时刻——兼评聂元梓8月5日的广播讲话》。杨勋跟聂元梓同为社教积极分子，此时公开站出来批评聂元梓。

10月16日晚间，聂元梓发表广播讲话，提出“上揪下扫”口号，作为实施文革的“方略”，把“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

近年，聂元梓否认自己当初提出“上揪下扫”口号，本文仅举数例，用聂“体己人”的白纸黑字证明，是她提出“上揪下扫”口号。

①1967年2月1日，《新北大》第33期，刊登“批判虎山行联络站”《彻底

---

清算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说：1966年10月份，当两条路线的斗争正处紧张的时候，聂元梓同志及时地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提出“上揪下扫”的战斗任务，真是好得很！②1967年2月4日，聂元梓的左膀右臂刘国政在校刊《新北大》第34期第三版发表《孔、杨有罪，罪该万死》说：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晚上，聂元梓同志发表了广播讲话，提出了“上揪下扫”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正确的，是代表了我校广大革命师生意志的。

10月18日，校刊《新北大》第16期，第二版，刊登《我校召开学习和贯彻林彪同志指示座谈会》，聂元梓和孔繁讲话。

同期第三版，本刊讯《首都复员转业军人红卫兵新北大战斗队成立》。报道校文革委员会负责人聂元梓、孔繁、聂孟民、白晨曦等人出席了大会。

同期第四版，哲学系孙月才、王树茂、罗远鹏、陈炳泉、王中发、林同华、黄希庭、陆云彬、金可溪、许抗生1966年10月12日《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和特点》：在这场大辩论中，我们不是为了保校文革中的某一个人。聂元梓同志不称职，可以由其他革命左派来领导北大革命。

10月20~21日，校文革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提出“常委首先要整风”。聂元梓主张“要把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辩论进行到底”。

10月24日，在校文革常委会上，聂元梓提议：因五个常委外出串联，经部分常委研究，提名陈影、姜同光、侯汉清、孙蓬一、王海忱等参加常委会议，加强常委集体领导。会议同意聂元梓提携拥聂人士的意见。聂还决定由孙蓬一管全校的运动、组织和作战。

10月25日下午，组织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诞生五周年纪念大会。校文革主任聂元梓等人出席了大会。…“五·二五”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宋一秀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代表聂元梓等七位同志讲了话，竭力铺张扬厉，自我标榜。

1966年10月底，聂孙决定历史系62级学生刘国政取代教员杨克明，改组校刊《新北大》编辑部。文革展览馆里聂元梓的画像特别多，一个小小展览，有二十多幅。外校同志看完展览后，一个突出的感觉是：“聂元梓真了不起！北大有聂元梓，真幸福。”

10月，从校文革筹委会时期开始，北大出现了众多造反派组织。围绕聂元



梓组建北大“党组”等问题，原来和聂在一起的“老左派”内部发生矛盾，并逐步公开化。红卫兵组织之间因为批评聂元梓和拥护聂元梓开始斗争，聂元梓一统红卫兵的努力，失败了。

11月1日，校文革集会，纪念“六一”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五周年，继续批判李雪峰。下午，大会在东操场隆重举行。聂元梓在会上讲了话。这一天，在“五四”运动场，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六个组织也举行了“纪念六一”五周年群众大会，着重批判聂元梓、校文革执行了“一条新的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发表倡议书，号召批判聂元梓、校文革的这条“反动路线”。《聂元梓回忆录》记载：“关锋说，不能参加红联军、井冈山召开的大会，那些组织中有王任重搞的势力在继续活动。这样，第二天我就没有参加他们的大会，而参加红旗兵团等组织召开的大会，并说：“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台。”由于我这样的行动和我的讲话，使群众的对立情绪更加激化了。

1966年11月5日，《新北大》第20期，第一版转第二版，刊登本刊讯《十一月一日我校与外地来京串连的革命师生隆重集会，纪念毛主席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五周年，继续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25日和29日下午，新北大“捍卫毛泽东路线联络站”五十多个单位共同发起并先后举行了两次大会，纪念毛主席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五周年，批判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出席29日大会的有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刘建勋，以及校文革主任聂元梓。

11月8日，由孙蓬一修改、定稿，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署名的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校内贴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会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就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并没有彻底打倒邓小平之意。但是，聂孙错会意了，急于抢功，押宝式贴出了这张大字报。上面没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下面对于这张聂孙自诩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呼应者寥寥。

11月13日，晚9时许，中央文革给聂元梓打电话说：江青很关心你，很爱护你，为了你的安全，今晚让你离开家，带上你认为最重要的材料，住到另一个地方去。聂元梓当晚就由中央文革办事组派车接到花园街中央文革记者站住。

11月14日下午，王力、关锋找聂元梓、孙蓬一、夏剑豸、李清昆、杨文娴、

---

李玉英等人，到政协礼堂小会议室谈话，要他们写张恩慈的材料。中央文革要整张恩慈，但是先授意下面写揭发材料。

11月16日，江青在钓鱼台召集陈伯达、王力、姚文元等人在她的住处策划，派聂元梓到上海造反。江青说：“叫聂元梓到上海去一趟…再从北京选一些左派去，支持上海造反派，造成造反派的<sup>优势</sup>，冲破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统治”。

晚，江青找聂元梓密谈，江说：“王任重是国民党派来的”，“你不要追随他”。（王任重当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分管大专院校）江青又说：“你到上海去串联，我们中央文革是支持的”。【笔者注：江青11月16日晚间当面向聂元梓就王任重的<sup>问题</sup>“路线交底”，聂元梓立竿见影，立马着手整王任重的材料。11月18日去上海之前，聂元梓整王任重的材料已经打包，经王广宇的手交到“中央文革”，刻不容缓地给王任重“落井下石”！江青死后，2005年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154~159页，第十章《从工作组到校文革》又单立一节《不理睬江青，听王任重的》，好像她在整王任重过程中，是个<sup>没事人</sup>。政治人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莫此为甚。】

11月17日，王力找聂元梓谈话，根据江青谈话精神，对聂作了具体安排：到上海和中央文革记者站甄文君建立联系，有什么材料也送甄文君，有什么问题要请示中央文革也经过甄文君。

11月18日，上午，聂元梓从花园街中央文革记者站回校，召开校文革常委会，传达江青讲话要点，又把王力讲话向（跟随她一起去上海的）孙蓬一等人作了传达。当天晚上，上了火车去上海。

11月19日，聂元梓按江青的授意，带领孙蓬一等人到达上海，住华东师大。当晚聂召开北大在沪串连人员会议。他们宣布了“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的计划。他们立意把常溪萍打成“北大社教的叛徒”、“暗藏的反革命黑帮”进行批斗、迫害。聂说：中央文革派我来上海的目的，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组织发动学生、工人、机关干部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央解决上海问题作调查研究。上海市委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反动堡垒。并提出将红旗兵团在沪串连人员组成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11月21日，校刊《新北大》登出拥聂派红旗兵团的大字报——《最严厉谴

责新北大红联军、井冈山红卫兵等捣毁〈新北大〉临时编辑部的暴行》，并且要掀幕后策划者。

聂元梓带领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成员三十多人围攻上海市长曹荻秋，说曹是保皇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当面质问曹荻秋为什么保常溪萍。

上海一些大专院校造反派开会欢迎聂元梓，聂在会上发言说：“上海市委是反动堡垒，烂掉了”、“常溪萍是大叛徒”，“曹荻秋、陈丕显是刘、邓的人，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上海市委的反符合斗争大方向”。

11月22日，聂元梓等经过几天串联后，参加“上三司”的成立大会，会上批斗上海市领导人曹荻秋、杨西光及（聂元梓要求增加的）常溪萍等。大会给聂元梓、孙蓬一佩戴纪念章，聂元梓在大会上发言，基调是“打倒曹荻秋”。大会上给常溪萍挂了牌子，会后给剃了阴阳头。常溪萍开始受迫害，一年多以后家破人亡。

11月23日，聂元梓到南京参加“六省一市”的万人大会，煽动群众揭发、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24日，上海市群众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欢迎“第一张大字报”作者大会，聂元梓在大会上讲话，攻击曹荻秋等上海领导同志。聂元梓宣布：“不打倒曹荻秋不回北京！”此后上海市群众才普遍提出“打倒曹荻秋”的口号。

11月25日，上海市各造反派组织召开全市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大会，聂和孙蓬一、李醒尘商量内容，由李醒尘在大会上发言，内容同24日聂在文化广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一样，攻击上海市委和曹荻秋等领导同志。

11月27日，聂元梓与张春桥密谈——聂元梓一到上海就向中央文革记者站甄文君表示：张春桥如来上海，我想同他谈谈。27日甄文君派车接聂元梓与张春桥密谈。

12月16日，聂元梓离沪回校。她在沪期间召集“上海工总司”、“上三司”等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要求他们“召开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聂元梓离沪时，留下孙蓬一等人继续进行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的造反活动。

聂元梓回到北京，向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作了汇报。张春桥等人认为“聂元梓实现了江青的布置，巩固和扩大了安亭事件的成果，冲破了

---

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统治，造成了王洪文这一派造反派的优势……”。

12月18日，聂元梓在上海回京前与孙蓬一策划了继续“打常”的问题，18日孙蓬一在上海市文化广场斗争常溪萍大会上，诬陷常“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使常溪萍受到极残酷的迫害和人身侮辱。残酷迫害常溪萍，殃及妻子和全家。冯乔《北大社教与常溪萍之死》有详细的记叙，（《百年潮》2008年第6期）。

1966年12月19～21日，聂元梓攻乎异端，在反击“十二月黑风”的口号下，批斗、抓捕“井冈山”、“红联军”的重要成员。从12月19日至21日，红旗兵团等组织不分日夜批斗“井、红”成员以及杨炳章、乔兼武。

12月23日，红旗兵团等组织查封“井冈山红卫兵”和“红联军”。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康生针对校内有人反对校文革、聂元梓实行高压政策的情况，说：“就是要使反动言论永远抬不起头来，他们感到有压力，压得好”。江青也对聂元梓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

“井红”被拥护聂元梓的“红旗兵团”牛刀宰鸡，砸抄、取缔、殴打、批判、斗争、“扭送”公安部，被逼自杀，备极迫害之惨痛。幸亏“老井红”和“主义兵”，这些群众组织，都是“根正苗红”的年轻学生组成的，里边找不到“长胡子的”、“摇羽毛扇的”。“井红”被“红旗兵团”用暴力手段打垮、打散、打趴下，半年以后，东山再起，进入反聂的“北大井冈山兵团”，这帮人的“胆大”，说起来，“根正苗红”、“腰杆子硬”，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12月25日，清华大学蒯大富率五千人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蒯大富抢先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后，北京一些高校也跟着喊出了这个口号。这次政治潮头弄潮，使得蒯大富名声大振，一时风头盖过聂元梓。

12月27日，孙蓬一留沪继续造反，按照聂元梓部署与华东师大组织“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进驻上海市委，参与了上海第一次大武斗——康平路事件。

聂元梓控制的北大红卫兵与清华大学井冈山（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等联合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会上发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1966年12月下旬，聂元梓亲自乘坐“华沙牌”轿车由亲信陈葆华陪同，带

领二十几个乘坐大轿车的“北京大学红卫兵”到“南长街”，对于自己的“二婚丈夫”吴溉之（老红军）实施夜半抄家。这一段史实，见牛辉林《夜半抄家记》，刊载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吴溉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首先是聂元梓对他的迫害，于1968年7月2日含冤去世。【笔者注：“夜半抄家”之后，吴溉之跟牛辉林他们倒是“不打不相识”，有了来往。1967年春天，牛辉林、吴金岳等人两次登门拜访时任中央监委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吴溉之老人。吴溉之当时是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的丈夫。牛辉林受聂元梓之命，曾以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的名义介入了聂与吴之间一些家庭纠纷。在访问中，牛辉林就月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向吴溉之老人作了说明并表示歉意，也希望能了解其中原委。吴溉之老人坦诚平和地讲述了他和聂元梓的婚姻故事，大体内容是：1965年解放军总后勤总副部长唐天济向他介绍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聂在北大社教中给校长陆平提意见，挨了彭真北京市委的整，政治压力很大。聂早年离婚，单身，想找一位政治地位高的干部结婚，以减轻政治压力。吴溉之前妻去世，也是单身，唐天济有意从中撮合，介绍吴聂元梓结成秦晋。吴当时说，我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还结什么婚吗？唐说可以先认识了解一下。之后吴与聂见面，聂元梓很热情地说：我每天下午四点下班后就可以回家来照顾您。不久成婚，聂元梓入吴溉之家共同生活，还算和谐。彼时吴溉之家中常有高级干部聚会，包括中组部长安子文等人。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七人大字报贴出，有几天感觉精神压力很大，吴老还尽力给她一些安慰和鼓励。后来，聂元梓的大字报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聂元梓成了毛主席支持的革命左派。1966年八、九月，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任校文革主任，造反名声响遍全国。自此，聂元梓就搬到北大去住，不回来了。聂呐，她拿走了一些吴溉之前妻和孩子的物件，孩子有意见，到北大去找她要，才发生了那些矛盾和事情——正是后来牛辉林《夜半抄家记》叙述的聂元梓让北大红卫兵把吴家两个孩子从北大强制送走，聂又亲率陈葆华、牛辉林“夜半抄家”的公案。“红旗飘”的牛泰升亦有记述文字。】

1967年1月1日，校刊《新北大》刊登聂元梓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说要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反动逆流”，号召“立即行动”，从对立组织中抓“反革命分子”，揪“反革命的幕后指挥”。说，“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

坚决镇压”。他们抓捕了杨炳章、乔兼武和经济系教师杨勋等人，扭送公安机关。

张承先说：1967年初，聂元梓等人又根据江青的指示把我揪回北大。到北大后，孙蓬一与我谈话，并让我看了江青批件，大意是说对张承先不能轻轻放过，要揪回来批透斗臭。根据她的这一“指示”，又对我进行了多次批斗。这些批斗会的规模并不大，主要是追后台。重点追问邓小平通过他的儿子给工作组下了什么“黑指示”。我回答说，我根本不知道北京大学里有邓小平的儿子，系工作组也没有向我反映过这一情况，根本不存在邓小平通过他儿子给工作组下指示这回事。追来追去没有结果，但就是不放我离开北大，（聂元梓）把我软禁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达半年之久。直到后来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在运动中不要揪住工作组问题不放，这才放我回到河北。

1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陶铸大会，聂元梓在会上发言，点了邓小平、彭真、李井泉、廖汉生、吕正操、王恩茂、黄新廷、荣高棠、周荣鑫等人的名。同日，校刊《新北大》刊发李清昆在校文革常委会上的发言：《孔繁、杨克明同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其中说：“江青说孔繁、杨克明的活动就是刘邓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同日，《新北大》发表《乘胜追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社论说，“要弄清孔、杨的反动面目，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说“反革命分子杨勋”等和“虎山行”、“井冈山”、“红联军”中的“某些领导人充当了急先锋”。“他们围攻校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谁要坚持反革命，就要对他实行专政”。

1月13日，校刊《新北大》第26期，转发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十一点多钟，沸腾的人群高举毛主席像和语录牌，敲锣打鼓，斗志昂扬，在大饭厅聚集。聂元梓在大会上讲话。

1月16日，陈伯达、江青召见聂元梓、孙蓬一。陈伯达说：“王任重很坏，当着江青同志的面讲了孔繁、杨克明很多好话，讲了聂元梓很多坏话。”江青对聂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孔繁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揪他！”。

【笔者注：讲好话，讲坏话，中国政坛，讲话就是政治、就是政治斗争。聂元梓加罪牛辉林，予以严酷的斗争，其中一条罪名，就是“牛辉林讲了江青的坏话”。】

1月17日，聂元梓根据江青、陈伯达授意，组成校文革夺权指挥部，孙蓬一、

徐运朴等任夺权指挥部指挥。近年聂派写手的文章，瞪着眼睛把孙蓬一的名字隐而不提，算是一种“春秋笔法”。

1月18日，聂元梓召开各单位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聂元梓提出，“要立即组织人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和北京市人委各部进行夺权。要赶快行动，去晚了就不成了”。会后连夜出动大批人到中央各部和北京市夺权。其中去高教部夺权的人员进行了“四抄”：抄了一些处以上干部的家；抄了各办公室；抄了“黑材料”；抄回了各部门的大印。有资料称，聂元梓、孙蓬一夺了三十多个部委的权。

校刊《新北大》第27期，第一版转第二版，报道《万人宣传队奔赴前线，横扫经济主义妖雾》：11日深夜，我校举行声援上海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图片上，身着棉大衣的聂元梓在大会上照稿讲话。

1月20日，校刊《新北大》第28期，刊登聂元梓1月19日晚8：00对北京大学全体革命师生所做的广播讲话《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万岁》。

1月22日，江青在天派部分高校造反派代表座谈会上不惜“以身作则”支持聂元梓，批评蒯大富：你对北大的‘虎山行’、‘红联军’、‘井冈山’的态度是错误的”。我接到一个“公告”，是“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的。很奇怪，为什么第一个组织就是清华井冈山。清华井冈山要明确表态。听说清华原来还要北大的“虎山行”。你们一定要表态。你在北大的“虎山行”，还有…（聂元梓答：井冈山、红联军）你的态度是错误的。有人诽谤聂元梓同志，聂元梓同志有缺点错误，我也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是共患难的战友，是和反动路线作斗争的。

1月24日，校刊《新北大》第30期，第一版，刊登《希望北大同学能做出样子来，陈伯达、江青同志做重要指示》：一月十六日晚，陈伯达、江青同志接见了我校革命师生代表聂元梓、孙蓬一同志，并做了重要指示。

1月24~26日，高教部“延安公社”和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大批人到北大校内示威游行、刷标语，反对聂元梓。“北大红旗兵团”则提出：“反新北大就是反动，反聂元梓不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就是混蛋糊涂虫”。北大文革“反聂即反动”源于此时。

1月27日，聂元梓同清华大学蒯大富等筹划组织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举

---

行成立大会。会上通过、发表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倡议书》，说要把北京市的“党权、政权、财权、大权小权统统夺过来，夺它个一干二净”。

2月1日，支持聂元梓校文革掌权的“红旗兵团”、“红教工兵团”、“东风兵团”等红卫兵造反组织，组成了“新北大公社筹备小组”。

校刊《新北大》刊登《彻底清算北大“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的文章，说：“‘虎山行’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小集团”，“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等组织“是有反动社会基础的”。

2月3日，聂元梓接见“作协造反团”负责人，决定“中国作协造反团”和“新北大”联合组织批判班子，批判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从而批判朱德委员长。《新北大》三打朱老总，始于此时。前此，1967年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召见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笔者注：人大“三红”】头头说：“不要以为打倒刘邓陶就完了，还有呢。”看到红卫兵有所不解，马上又补充了一句：“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个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

1967年2月4日，校刊《新北大》第34期，第一版转第四版，刊登聂元梓《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第三版，刊登刘国政《孔、杨有罪，罪该万死》：“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晚上，聂元梓同志发表了广播讲话，提出了‘上揪下扫’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正确的，是代表了我校广大革命师生意志的。”

1967年2月14日，校刊《新北大》第38期，第一版，刊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2月10日《重要通告》：宣布2月7日校文革扩大会议改组校文革常委会的决定。决定把孔繁、杨克明从校文革里清除出去！文革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改组常委会。新改组的常委会主任：聂元梓；副主任：白晨曦、姜同光、徐运朴、裘学耕、王海忱、杨学琪；常务委员：孙蓬一、王茂湘、段心济、刘国政、戴新民、侯汉清、冯迎玺、陈影、唐春景。新北大公社筹备小组保留名额一名。《通告》说：孔繁、杨克明“操纵群众，造谣中伤”，“使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处于内外夹攻的困难境地”。“对这样的坏家伙，我们就是要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从校文革里清除出去”。同时把不同意见者牛占文、刘宗义、廖淑明、聂孟民赶出常委会。

2月15日，“新北大公社”召开成立大会。“新北大公社”是全校一统的拥聂



组织。聂元梓代表校文革表示最热烈祝贺。“新北大公社”一统各群众组织，自外于人，从此种下师生群众大分裂的根苗。

2月21日，校刊《新北大》第42期，第一版，本刊讯《敲锣打鼓送亲人》：聂元梓同志讲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她说，解放军同志和我们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共同度过了一段战斗的、胜利的日子！他们为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我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做出巨大的贡献！

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上面安排四十六岁半老徐娘聂元梓担任“红代会”核心领导小组组长。

3月1日，校刊《新北大》第44期，第一版转第三版，刊登《在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红卫兵代表大会上中央首长讲话》。周总理讲话：“我们回想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张大字报出在北京，那是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写的，毛主席亲自发现并批准在报纸上公诸于世，公诸于全世界人民中间，这就在世界点起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声号炮。这次进入到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上海的工人阶级带了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反经济主义，带头进入了夺权斗争。”

3月3日，哲学系教师郭罗基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大字报揭出了聂元梓涂抹录音带的事，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郭罗基对保聂派的人们说的名言，“你们把聂元梓看得很伟大，是因为你们自己跪着。”郭罗基的名言，一夕风靡北大。

1967年3月4日，校刊《新北大》第46期，第二版，刊登《聂元梓同志代表校文革谈整风问题——立即行动起来，边整边改边战斗》：她说：我衷心地希望革命师生员工批评我，帮助我，这样，加上我的主观努力，才不会使我成为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郑斯宁《聂元梓的悲哀》：聂元梓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井冈山人要反对她？她是政客，只有“阴谋论”一个思路，以为凡事必有利害关系，必有后台指使。作为一个最普通的井冈山人，我反对聂元梓的原因很简单：她不学无术，除了政治投机，没有任何本事，而且心胸狭窄，文过饰非，从来不做任何自我批评，找一切借口无情打击反对她的人，而且脸皮之厚，超过任何文学作品。由这种人执掌中国最高学府，天理难容。我对她的认识是逐步的，从真心想帮她整风开始。可对不上茬呀。所以，到后来，只要存在反对聂元梓的空间，我就会加入。无任

---

何人指使，也无任何个人算计，100%的良心与正义感使然。她永远不可能理解的！文革中各地各单位的两派情况不同。但北大的两派非常简单：新北大公社多（整人的）左派；井冈山兵团多精英，而且是有正义感、讲良心的精英。笔者注：一样运动，两样人性——在北大，因为私刑、杀人，干犯刑法，文革后被系狱、判刑的，全是“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人。】

1967年3月14日，校刊《新北大》第50期，第一版，刊发《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供讨论和试行用)中发67(081)号》：聂元梓代表首都红代会发了言。她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革命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

中文系1962级女学生沈达力，曾参加“红联军战斗队”，批判过聂元梓。江青为保聂元梓，诬“红联军”是“反革命组织”，聂孙揪斗、围攻“红联军”成员。沈达力被系“系文革”黄介山等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大帽子进行批斗，3月18日服毒而亡。

3月27日，陈伯达、成本禹以座谈教改为名来到北大。他们对社会上有人贴大字报炮轰、攻击周总理时说：“现在提到炮打某某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任何人都不可随便与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陈伯达还说：“炮轰一个人不能简单地说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会后聂元梓、孙蓬一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传达，并将讲话印出来，广为散发。同时连续开串连会，说“要揪大个的”，“要揪出新的黑线”。聂、孙派出许多战斗队，到国务院各部、委，收集情况，整理负责同志的材料。

1967年3月28日，校刊《新北大》第56期，第二版，本刊讯《边整边改边战斗》：三月十五日聂元梓同志代表校文革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对前一段工作做了总结和检查。大家听了深受感动，感到聂元梓同志不仅是同陆平黑帮、刘邓反动路线斗争的闯将，而且也是我们破私立公，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榜样。

1967年4月3日下午，首都红代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会”。聂元梓致开幕词。

1967年4月4日，校刊《新北大》第59期，第一版，本刊讯《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十周年，欢呼新北大公社红卫兵在革命风暴中诞生。向刘邓发起总攻，掀起斗批新高潮。聂元梓、蒯大富、李敦白等同志在万人大会上

讲话》。第一版转第三版，刊登聂元梓近五千字讲话《大斗、大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4月8日，校刊《新北大》第60、61期合刊，第六版，简讯：《北京地院东方红革命委员会成立》北京地质学院革命“三结合”权力机构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三日，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市委周景芳和丁国钰同志到会表示热烈祝贺。聂元梓、蒯大富、李敦白等同志出席了大会，并发了言。

4月14日，康生给聂元梓写信，说：“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组织了调查彭真、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结果，看到旧北京市委内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聂元梓依照康生的信，组织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

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任革委会副主任。

聂元梓于20日前后，授意“第二战斗队”队长杨建铎派人调查胡仁奎等人的“特务”问题，借以诬陷彭真。专案组长写出了《关于胡仁奎、李伦和彭真、安子文、薄一波关系的调查报告》，经聂元梓、孙蓬一上报康生。康批转中央专案办公室“彭真专案组”。

1967年4月25日，校刊《新北大》第67、68期合刊，第一版，刊登本刊讯（配有“大会会场”照片）通栏标题《十万革命大军会师北大，摧毁旧市委，斗倒刘少奇，愤怒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刘仁、万里、许立群、韩光、宋硕、陆平、彭珮云的滔天罪行》：聂元梓同志讲话。她说：“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以来，把北京大学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对毛主席，对党犯下了滔天罪行。现在是对他们总清算的时候了！”

1967年5月6日，校刊《新北大》第71期，第一版，本刊讯《毛主席无限关怀新北大》：聂元梓同志说，当毛主席和她握手时，毛主席亲切地说：“新北大！新北大！”她激动得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说：“您的新北大！毛主席的新北大！”

5月31日，聂元梓校文革常委会决定6月1日为校庆日。

5月，聂元梓派高云鹏去汉中653分校，以驻汉中分校宣传队负责人身份负责分校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校斗、批、改委员会。崔雄崑任主任，杨学琪任副主任，主要成员有刘国政等人。

---

1967年6月1日，校刊《新北大》第80~82期合刊，第二版，刊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大海航行靠舵手》：夺取政权难，掌握政权也难，巩固政权更难。我们一定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

1967年6月5日，校刊《新北大》第83期，第一大版，报道《全国各地七万余革命战友会师新北大，最最热烈欢呼毛主席伟大战略措施的光辉胜利》：大会由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孙蓬一同志主持。聂元梓致开幕词。

6月5日，晚，陈伯达来校，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笔者注：聂元梓自以为是，到处伸手，有时不听“上面”的话，引起陈伯达不满，批评了她。陈伯达也不敢打倒毛树立的这个典型。井冈山与聂的矛盾在校内不在校外，自始至终，“上面”没有一个支持井冈山、为井冈山说好话的。】

1967年6月8日：陈伯达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

1967年6月10日，校刊《新北大》第84期，第一版，我们相信，通过整风，以聂元梓、孙蓬一同志为首的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

聂元梓贴出《掌握斗争大方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说要“抓主要矛盾，狠抓大方向…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

陈伯达说：“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6月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爱护的”。他还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

6月28日，金敬迈对聂元梓说：“关于抗缅问题，我国政府的抗议太软弱了，我们文艺界准备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发表声明，抗议缅甸政府的反华暴行，戚本禹要我请你参加我们的大会并讲话”。聂答应去，并表示要“红代会”的同志也去。接着戚本禹又找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戚本禹说，“我们的政府调子不高，总理作事总是愿意很稳重，谨慎的，未免有点太保守了。你们要到外交部找领导同志，提出意见和批评，所以一定要召开一个群众大会，要用群众的名义

发表声明，表示强烈的抗议。会后要分两路游行，一路要到缅甸大使馆，一路要到外交部，也让外交部领导看看群众的革命义愤，仅仅发表这样的声明够不够，和当前的革命形势相比怎么样？”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参加了大会。会后聂元梓按照戚本禹的指示，率领红卫兵到了外交部。

6月，“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称：“1967年初，曾加入‘湘江风雷’并任该组织挺进支队北京支队负责的许××，要我们把陷害总理的‘0007密令’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我请示了聂元梓，她说：你们把它送到中央文革记者那里。由聂元梓电话联系，我到44楼三楼，向中央文革记者上交了这份材料。”

“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争队”队长赵建文称，“1967年春，从民族学院那里知道‘0007密令’问题后，怀疑总理和这个问题有关系。聂元梓、孙蓬一把我们找去做了汇报，决定到湖南调查。”聂元梓说：“你们可以去，湖南是有这个密令，他们还来北京上告过，你们去了可以找一下‘湘江风雷’和‘高司’，也可以了解一下湖南军区的情况。聂还议论湖南军区是总理支持的。他们让去湖南的矛头是指向总理的。”

“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副队长潘国华称，“5月上旬，赵建文对我讲：陈××（原无线电系学生）和孙蓬一联系，他在长沙调查了‘0007密令’的情况，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孙蓬一让我找陈把材料取回来整理上报。回来后，赵建文对我说：聂元梓、孙蓬一要赶紧把材料整理上报。赵建文还说：要赶紧把‘0007案件’材料整理上报，总理就是有错误，以后中央不保总理时，整理的材料就是反总理的材料。”【笔者注：聂派“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在周恩来问题上的明修暗度，两面手法，黑幕重重。】

赵建文的说法是，“关于‘0007密令’的问题，是聂元梓、孙蓬一及他们的黑后台向中央进攻的炮弹。1967年6月5日以后，陈伯达的秘书到北大来，我向他做了汇报、送了材料。除了‘除隐患’自己送之外，姜同光告诉我聂元梓也给了陈伯达。”

聂元梓说，“赵建文对我说：材料中涉及到总理，这些材料将来都是很有用的。可以从正反中发现问题。我给想了一个办法，这些材料，现在正反的都在一起混着，就这样摆着不要加以整理，也看不出来是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但

---

是我们自己可以记住，要研究问题的时候，从正反中可以分析，需要的时候，一下子就可以整理出来。赵还说，‘他已经复印了学部的材料，里面有总理的…’。”

聂元梓说，“我说赵建文出了一个好主意，就这样办吧。这就形成了我们在反王、关、戚的掩护下也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的指导思想和作法。‘除隐患’后期的工作，就是做的这些工作，只有赵建文是积极参与制定这个指导思想并是具体执行的人。‘除隐患’后来整理的一、二、三批材料，是指向总理的。”

7月10日，陈伯达发表讲话说：“我批评聂元梓是支持她、爱护她、帮助她。聂元梓不要打倒，还要她当红代会核心组长。对孙蓬一也不要打倒，‘要一看二帮’。”并对反对聂元梓的人说：“你们用我的话攻击聂元梓，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笔者注：陈伯达支持聂元梓、压制反聂派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

7月11日，校文革召开师生员工大会，聂元梓代表校文革常委会提出“复课闹革命”十点意见，确定崔雄崑任复课闹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7月12日：“新北大红旗飘”、“新北大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联合编辑的反聂派《新北大报》创刊号出版。

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召开全校“痛击刘少奇猖狂反扑大会”，聂元梓作动员报告，把刘少奇的检查称为“反攻倒算的宣言书”。会上发布“动员令”，动员群众积极投入“批判刘少奇的新高潮中”。

校刊《新北大》第93期，第三版，简明新闻《向武汉革命造反派致敬》：“七日下午，我校聂元梓、宋一秀等同志与武汉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举行了座谈。会上，武汉革命造反派战友以血泪的事实，控诉了“武老谭”（指陈再道）在武汉策划大规模武斗，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聂元梓、宋一秀同志代表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对武汉革命造反派表示最坚决的支持。”

7月14日，聂元梓校文革把胡耀邦、胡克实揪来北大批斗。

7月18日，聂元梓召开“打倒刘少奇、揪斗邓小平、彭真誓师大会”。大会由聂元梓主持并讲了话，崔雄崑也在大会上发了言。聂元梓的讲话、崔雄崑及“新北大公社”等头头的发言对刘、邓、彭进行攻击。大会决定全校革命师生于19日进城游行，勒令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邓小平、彭真到北大低头认罪。

7月19日，聂元梓等动员全校师生员工，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队伍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开誓师大会，聂元梓讲话，表示“揪斗刘少奇的决心”，然后派出“刺

刀见红战斗队”等红卫兵队伍开到中南海西门，参加“揪刘火线”。此后，聂元梓多次去慰问北大学生，并代表红代会慰问其他高校学生、鼓动他们“一定要把刘少奇揪出来，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于“揪刘火线”出力甚巨。

7月21日，校刊《新北大》第96期（武汉专号），第一版，报道《阶级友爱比海深——我校举行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大会》：七月七日下午，聂元梓、宋一秀等新北大革命派和武汉地区各革命组织代表座谈。七月十九日我校又举行万人大会，愤怒声讨了王任重、陈再道之流的滔天罪行。聂元梓同志出席了大会并讲话。她说：“你们是来自武汉地区斗争最前线的英雄战友！你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你们是我们新北大革命派学习的好榜样。我们永远和你们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最后她和革命群众一起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陈再道！”

第四版，《把刘邓揪出来斗倒斗臭》：七月十九日，新北大公社数千名战士举行游行示威，猛烈反击刘少奇的疯狂反扑。战士们沿途高呼革命口号，高唱革命歌曲，张贴革命标语。在中南海前战士们愤怒示威，强烈要求把刘邓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最后在天安门前举行了誓师大会，聂元梓同志带领大家宣誓，新北大革命师生永远紧跟毛主席，积极投入当前的大批判运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7月28日，校刊《新北大》刊登江青接见河南代表团，发表“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讲话。

聂元梓召开“红代会”核心组全体会议，会上蒯大富传达戚本禹指示，要在8月5日揪出刘少奇。揪刘指挥部还提出了揪刘计划。蒯大富说：“兵分两路总可以揪出来，一路去找总理，一路直接到刘少奇住的地方去揪他。”聂元梓说：“我同意兵分两路”。聂元梓还传达了陈伯达、戚本禹在北大的讲话：“炮轰一个人不能简单地说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任何人都不可随便与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

本月20日左右的一天晚上，“新北大公社”外联组组长刘××到聂元梓家，刘说：“如果总理不批准把刘少奇揪出来，建工‘八一’绝食饿死了群众，责任就是总理的了”，聂元梓说：“就是批准揪出来，群众七斗八斗，斗死了，或者给藏起来，刘少奇人没了，责任还是他（总理）的。”刘说：“这么说，批准也好，

---

不批准也好，总理倒台是一定的了。”聂元梓说：“一定倒了。”

本月末，聂元梓同孙蓬一等核心骨干一起议论：聂元梓说：“在揪刘问题上反映出来，是旧政府机关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对旧政府机构中的人员要轰一轰。在揪刘火线的问题上，总理的意见是保守的，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戚本禹是执行中央文革精神的。”孙蓬一说：“现在应对政府机构中的死角打扫打扫了，现在的形势很清楚，就是总理同中央文革的矛盾，我们还是紧跟陈伯达，站在中央文革一边。”王茂湘说：“就是一干到底，就是听陈伯达的。”

8月3日：聂元梓召集“新北大公社”头头们开会、传达红代会的决定，说“8月5日要兵分两路，一路去找总理，一路去揪刘少奇，我们北大一定要两路都参加，要有面对面斗争的决心。”会上决定北大再增派三百人到中南海“揪刘火线”。

8月5日，校刊《新北大》第104期，第二版，刊登本刊记者《揪刘火线上战旗如海，首都革命派大联合行动——把刘少奇从中南海揪出来斗倒斗臭！》：七月十九日，新北大公社社员、红卫兵在聂元梓同志带领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把刘贼揪出中南海。

8月12日，新北大“八一兵团”和石家庄“揪斗崔田民联络站”共二百余人冲进铁道兵司令部大院，抄家、抓人，并撬开保密文件柜，抢走2409份文件，造成严重失密。武汉“七二〇”事件后，聂元梓曾多次发表演说，说“现在揪军队一小撮成为运动的大方向”；“运动要深入发展，就必须从揪地方上的走资派，深入到揪军内一小撮”，“批带枪的刘邓路线”。

8月13日，校刊《新北大》106期，第三版，《简讯》八月一日，聂元梓与新疆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的代表进行了座谈。她高度赞扬了新疆以红二司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聂元梓代表新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并表扬了新北大赴疆战斗的同学。

8月19日，校刊《新北大》第108期，第二版，报道《我校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纪念“八·一七”、“八·一八”——新北大迎着暴风雨前进》：8月17日晚，我校革命师生员工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举行盛大集会。会上，聂元梓同志代表校文革、新北大公社讲了话。【笔者注：聂元梓几十年后，向离世已久的季羨林辩驳，说自己“不是新北大公社成员”，可是



校刊《新北大》明明说她“代表新北大公社”，她可是从来没有代表“井冈山兵团”呀！】

1967年8月25日，《新北大报》第三版《简讯》：8月21日聂元梓被迫传达陈伯达同志5月27日讲话。伯达同志说，北京挑起两大派斗争的后台就是聂元梓。【笔者注：陈伯达此说，一语中的，切中肯綮。】

9月1日，江青讲话，事涉聂元梓，聂元梓回校以后，把会上受到的批评都给“私吞”了，详见拙作《北大文革简史》。

1967年9月10日，校刊《新北大》第114、115期合刊，第一版，《热烈欢呼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发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批判刘邓陶新高潮》：八日晚，新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召开批判斗争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大会。会上聂元梓讲了话。

1967年9月14日，校刊《新北大》本刊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我校举行掀起拥兵和革命大批判新高潮大会》：…聂元梓代表新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首先在大会上讲话。

9月16日，江青讲话说，“有人说，新北大又立了第三功了，聂元梓你不害臊。老实讲，我们去年与陶铸做斗争时，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与王任重打得火热，他是一个CC特务。…北大已经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笔者注：见《北斗星》第163期。聂元梓吃了江青这一顿排揎，赶紧补做功课，在校刊《新北大》上紧锣密鼓，安排了几篇针对陶铸、针对王任重的大批判文章。另一方面，从这时候起，聂孙“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又多了一根“老保翻天”的政治大棒，随时可以打在他们认定的斗争对象头上。在聂派手中，“老保翻天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反聂派的《新北大报》发表《热烈欢呼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原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彻底翻案的公告》说：“新北大井冈山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造反组织，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文章还批判聂元梓、孙蓬一说：“你们残酷地打击一大片，数百人的劳改队迟迟不散，剥夺数百名干部、教员的选举权”。【笔者注：井冈山的《新北大报》说得对，说得好！人权问题，从来是“井冈山”与“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绝然分野。】

9月23日，校刊《新北大》第119期，第一版，刊登聂元梓代表校文革在九

---

月二十一日大联合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北大革命师生员工联合起来》。

10月12日，校刊《新北大》第124期，第一版，报道《我校革命师生员工隆重集会，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聂元梓同志在会上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发出的最新指示。

10月23日，聂元梓主持召开斗、批、改委员会，决定成立14个直属校文革的专案组，其中包括陆平、彭珮云、翦伯赞专案组等。抽调八十多人搞专案工作，广设“牛棚”，在44楼、第二体育馆、五斋、生物小楼、北招待所等处设立关押中层干部及师生的场所。

反聂派《新北大报》第17号发表“井冈山兵团”《关于彻底改组校文革，按系统、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严正声明》：“目前存在的北大校文革只能代表我校两大派中一派的意见，实际上是一个派文革。要实现革命大联合，必须立即彻底改组校文革。”

10月25日，校刊《新北大》第128期，第一版，本刊讯《我校今日开学闹革命》：校文革常委决定由聂元梓、崔雄崑、王茂湘等人组成开学闹革命领导小组。

11月18日，“井冈山兵团”召开大会，批判、揭发聂元梓、孙蓬一在干部问题上执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出聂元梓对于干部，搞的是“拥聂者亲，反聂者打”。

11月9日，校刊《新北大》第132期，第三版，刊登《战地火花》：十一月一日、二日晚，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召开“斗私，批修”讲用会。校文革主任聂元梓、革命干部崔雄崑和公社总部勤务员孙月才三同志在会上汇报了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的心得体会。

11月30日，校刊《新北大》报道：30日全校举行党员大会，由聂元梓宣布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的建立和正式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决定，组长聂元梓，副组长孙蓬一、崔雄崑。

12月2日，校刊《新北大》第139期，第一版，本刊讯《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正式建立》：11月30日下午，我校召开全体党员大会，由聂元梓同志宣布，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的建立和正式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决定，由谢富治同志和吴德同志审批。11月27日，吴德同志指示聂元梓同志可以立即恢复党组织生活。

领导小组是以校文革常委中的党员为基础，同时吸收革命干部和革命学生、革命工人参加而组成的。名单如下：组长聂元梓、副组长孙蓬一、崔雄崑，组员姜同光、王茂湘、段心济、焦锦堂、杨文娴、孔庆星、李文、刘冲。【笔者注：此时聂元梓的忠仆白晨曦因为“历史问题”，已经被刻薄寡恩的聂孙“清理阶级队伍”，无情地清除出局。】

1967年12月初，聂元梓就向心腹打手猖狂地放话说“打吧，打死几个也不要紧，顶多中央批评我几句。”12月9日，借王晓秋大字报笔误（给“毛泽东”三字画红叉），聂元梓发动数百人围攻井冈山25楼总部，殴打井冈山负责人侯汉清。

12月21日夜间，聂元梓指使上百名暴徒冲进燕南园56号周培源先生宅院，企图武力绑架周先生。他们虽然没抓到老派知识分子周培源先生，但是抄了周家，暴取豪夺，劫掠了文物字画，殴打了周夫人王蒂澂和女儿周如苹，把周家翻得一塌糊涂、砸得一塌糊涂。

1968年2月13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周总理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身份出国。

3月6日聂元梓作报告：我是有派性，派性是怎么产生的？私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敌人。一方面要检查自己的派性，另一方面要联系敌人，不联系敌人，就不能把仇恨记在敌人身上。【笔者注：“联系”二字，大有奥妙，伟大领袖最善于“联系”，聂元梓也谙其精髓。】

3月8日凌晨，江青、陈伯达同聂元梓谈话。

3月20日，深夜，“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组织群众到北大校园内示威游行。

为响应江青于3月15日和18日所说“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的两次讲话，校文革组织四千多人到天安门游行，提出“彻底粉碎反革命右倾翻案黑风”。

聂元梓校文革决定成立“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并指定高云鹏为总指挥，宫香政、黄元庄为副总指挥，卢平为政委。

3月25日：“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造反组织近万人聚集北大，进

---

行反聂、孙游行，并发生武斗。地院、农大、北邮等院校红卫兵组织开广播车到北大校内宣传，声援北大“井冈山兵团”。

晚，谢富治、吴德、丁国钰赶到北大讲话，制止武斗，要求“所有外校外地学生一律退出北京大学”。说：“到北大来武斗是错误的”，“打倒聂元梓的口号是错误的”，“希望北大两派在校文革领导下，在聂元梓领导下，把大家联合起来”，“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走”。

3月26日，校刊《新北大》第161期，第一版，本刊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关怀新北大，谢副总理亲临我校做重要指示：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陪同一起前来的还有吴德、丁国钰同志。谢副总理说：我是和聂元梓同志一起来的。现在希望你们北大的两派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在聂元梓同志的领导下，把大家联合起来。我们都要联合起来，北京的大学两派都要联合起来。

同期第二版，刊登《在传达谢副总理在市革委上重要讲话的全校大会上聂元梓同志的讲话》：我们坚决维护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绝不允许阶级敌人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刘邓陶黑司令部及其爪牙，当前的主要危险是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所掀起的右倾翻案、右倾分裂、右倾保守黑风，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3月27日，江青在首都十万人（打倒杨余傅）大会上讲话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她”。【笔者注：正是在这一天，“北大第一硬汉”樊立勤被聂孙的“专案组”绑架，残害畸零。】

3月28日～3月29日凌晨1时，临湖轩晚间会议上聂元梓拍板，校文革属下的新北大公社长矛队，有组织、有预谋地突袭31斋和29斋学生宿舍，把几百名赤手空拳的“井冈山”学生驱赶出去，引发了北大的大规模武斗，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新北大公社紧紧围困着反抗他们的“井冈山”学生据守的6座学生宿舍楼，长达4个月，120昼夜，企图把“井冈山兵团”彻底打垮、剿灭。

4月1日，驻校解放军代表传达温玉成两点指示：（一）两派广播台坚决停止播发有关引起双方群众对立情绪内容的稿件；（二）严格禁止制造和向校内运送武斗工具。违者，以挑动武斗论处。

4月4日，校文革召开声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杨成武、余立金、傅

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大会”。崔雄崑主持大会。会后，焚烧象征以上这些人的“草人”。

晚，李钟奇来校，限令“井冈山兵团”三天内交出刺伤聂元梓的凶手和后台，详见拙作《北大文革刺聂真相》。

4月5日，“井冈山兵团”发表《第二号动员令》，说“聂元梓到武斗现场”，“被两派革命群众包围，被人刺伤”。

1968年4月29日，校刊《新北大》第169、170期，第一版转第六版，报道《在毛主席最新指示指引下迎着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我校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隆重开幕》：聂元梓同志代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致开幕词。

4月下旬，聂元梓、孙蓬一下令组成“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三个专案组，布置手下抓这三个组织中的“反动小集团”。专案组先后抓捕颜品忠、韩琴英、徐运朴、王忠林等十余名师生，进行严刑审讯和逼供，颜品忠被专案组打得失去性功能，孕妇韩琴英被打得流产。校文革把北大一百三十余名干部集中成立“劳改大队”，送到昌平太平庄关押、劳动。

5月15日，校文革召开“欢迎井冈山兵团革命造反下山大会”。聂元梓在会上说“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操纵井冈山兵团的反动小集团的斗争，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5月16日：聂元梓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监改大院”（俗称“牛棚”，由“新北大公社”运营）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218名。“监改大院”设有监改人员二十多名，仍由历史系学生刘国政任总负责人。不少监改人员打人成性，院内气氛阴森凄惨。【笔者注：可参阅季羨林《牛棚杂忆》和郑培蒂《云捲云舒》。2017年8月31日网刊《记忆》第193期，昔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副总指挥宫香政对于“监改大院”发表“牛棚有理”论：“关进‘监改大院’对被揪斗人员的是一种非法迫害；但集中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减少了对被揪斗干部的冲击，我想是有些许道理的。”】

1968年5月21日，校刊《新北大》第177期，第三版转第二版，刊登聂元梓《毛主席最新指示在我校的重大胜利》：…操纵井冈山兵团的反动小集团及其黑后台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还要做垂死的挣扎。同期《新北大》发表评

---

论，把陈守一打成“大叛徒”。【笔者注：1966年5月份，康生之妻曹轶欧带“调查组”进北大，亲自策动法律系陈守一“揭发”陆平，被拒绝。随即策动聶元梓，双方一拍即合。说聶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跟康生没关系，怎么也解说不过去。在聂眼里，陈守一就成了“敌人”。陈从此被带上了“走资派”、“大叛徒”、“三反分子”、“投机分子”等一大堆帽子。妻子也被诬为“假党员”。遭受抄家、扣发工资和无数次的揪斗。使他老弱病体遭摧残。精神、生活受折磨，受到无止境的迫害和管制。】

5月底，聂元梓校文革编造了一份《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41号绝密报告，由聂元梓亲自签发，分别上报给江青和康生。在此期间，聂派专案组派人把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了三个多月，多次拷打，逼他们交待“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给他们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邓朴方被逼坠楼，高位截瘫，终身致残。1980年，北大校党委给邓朴方、邓楠发文平反，当面宣读、签收。

1968年6月3日，校刊《新北大》第181期，第二版，刊登本刊记者《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盛大集会，纪念毛主席批发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周年。大会由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主持，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在大会上讲话。

1968年7月24日，校刊《新北大》增刊共四版，第四版，《新北大简讯》：七月十七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中心是讨论如何贯彻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问题。会前会后，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向吴德同志、黄作珍同志、谢副总理汇报了北大问题。吴德同志说：“你们做了很多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样很好！”当吴德同志听到目前北大井冈山已有一千五百多名战士造反下山的消息时，吴德同志说：“好！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黄作珍同志对新北大代表讲：“你们自己解决！有力量自己搞，有聂元梓同志，校文革是权力机构。你们自己解决！”谢副总理也亲切地说：“你们自己解决，你们自己解决。”这是市革委会对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巨大支持和极大信任！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辜负中央、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夺取新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英勇战斗！【笔者注：毛在7·28召见会上说“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

还是对的。”看样子上面没有给聂元梓透过“四不”这个底，否则聂孙的可能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发力武斗，放手一搏。】

7月27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李可仲《接待蒯大富、王学文散记》记述：…郭平、李少华、温思源等战友畅谈了当年被打出去后，在北京大学被聂元梓诱骗、勾结北京卫戍区抓捕陈贤，无处安身的贵州四一人，是老蒯的部下王学文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驻进了清华十号楼，对老蒯的庇护表达感激之情。】当晚，聂元梓、孙蓬一召集系文革主任、“公社战斗团”团长联席会议，商量对付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高校的对策，商定：（一）拒之门外，让宣传队派代表与校文革商量；（二）抵挡不住则退入楼内，各自为战，做到人在楼在；（三）最后不行，聂元梓就领着大家到北大荒去。会后，连夜往楼内运送硫酸、燃烧瓶等物品。

7月28日，凌晨3时半至8时半，毛主席召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聂元梓、蒯大富清华、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五人，严厉制止大学的武斗。

【笔者注：毛亲自喝止北京高校武斗，聂元梓、孙蓬一武力剿灭北大“井冈山兵团”的黄粱梦碎。】

毛泽东：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就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

---

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就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你们赞成……什么？

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

聂元梓说：“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大家沉默片刻，相对无言。

毛主席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些会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

“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



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聂元梓，侯汉清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

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

江青说：“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可他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四一四，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平天下呢！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我们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说：“前年什么山反对林彪同志？”（注：李洪山）

---

总理、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主席说：“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下山的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笔者注：樊立勤早在3·29之前被聂派打残废了，聂元梓却说“没有搞他”。聂元梓就是个“言十妄九”的撒谎精。】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笔者注：牛辉林也被聂派打得不能。】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清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父亲63年搞投机倒把。”【笔者注：聂元梓大奸，御前咬侯汉清，陷害侯汉清，及至攀诬人家的父亲。怎不教人鄙视她？】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大组织，几个组织联起来背后有黑后台的，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

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你们五个领袖。”

今天没有邀请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1968年8月3日，校刊《新北大》第198期，第一版转第四版，报道《毛主席最新指示开新花》：听完聂元梓同志激情洋溢的传达，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冒着滂沱大雨游行欢呼。

8月21日，晚，宣传队有关人员与聂元梓及校文革的全体常委作第一次接触。宣传队向聂元梓、校文革提出三个质询的问题，要求解答。

9月1日，工、军宣传队举办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井冈山兵团”两派头

---

头“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聂元梓、孙蓬一、姜同光、卢平、侯汉清等 24 人参加。

10 月 15 日，宣传队召开三千人大会，聂元梓就校文革保卫组（习称为“二组”）砸“井冈山摄影组”作公开检查。会上，批评聂仍搞派性活动，无视和对抗工宣队的领导。

10 月 29 日，宣传队召开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珮云黑班底”戈华、崔雄崑（已自杀）等校系领导干部 15 人。聂元梓等两派负责人登台揭发、批判。

11 月 2 日，宣传队指挥部向北京市委写了《关于不同意聂元梓参加市党代表会议的请示报告》，没有获得市委批准。

11 月 21 日，宣传队组织六百人会议，对聂元梓进行“再教育”。对她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腐朽的两面派作风”作“严肃批评”。“新北大公社”有的负责人揭发说：聂当市革委会副主任后总嫌自己权小，聂讲，“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不如当民主人士呢”。

12 月 18 日，第二期为人民服务学习班今天开办。学员全部是哲学系的，主要是校文革聂元梓、孙蓬一及哲学系的有关人等共 19 人。

3 月 19 日，市革委会负责人召见驻北京大学宣传队指挥部十多位负责人，指示要统一思想，提名聂元梓为党的九大代表。宣传队连夜召集连长、指导员及各单位负责人开会，统一思想认识。

3 月 20 日，宣传队召开全体队员会议，经讨论，同意提名聂元梓为“九大”代表。【笔者注：《聂元梓回忆录》说是“政治需要”。】

3 月 21 日，市革委会负责人接见北大军、工宣传队指挥部十多位领导人，传达派 8341 部队进驻北京大学的指示。宣传队指挥部向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写报告，正式提议聂元梓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971 年 2 月 17 日，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决定并宣布对聂元梓隔离审查。

1972 年 6 月 26 日，校党委会讨论确定，北大（校文革时期）的重大反革命事件有：围困中南海（指“揪刘火线”）、午门抗缅大会、利用 0007 密令调查整周总理的黑材料、反军乱军、组织人员到国务院各部调查（根据陈伯达的命令）等。这些都是“五一六”案犯的罪行，聂元梓、孙蓬一是这些事件的主犯，

还有从犯多人。

1973年2月21日，校党委常委会开会，讨论清查“五一六”的情况和处理意见。会议认为，经二年清查，北大九件重大事件及涉及的117人的问题已查清。认定聂元梓戴“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由群众监督，以观后效，报上级批准执行。认定孙蓬一是助恶有据、民愤极大的重犯，决定戴帽子，劳动改造。【笔者注：耸人听闻的全国“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纯属自上而下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聂元梓、孙蓬一是北大仅有的两个戴“五一六”帽子的“主犯”。“从犯”们近年在写翻案文章，否认自己跟随聂元梓犯下的各种具体错误和罪行。】

1977年1月20日，哲学系总支、武保部向校党委上报《关于聂元梓、孙蓬一的情况报告》。《报告》反映：聂元梓声称她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审查她是不对的；孙蓬一到哲学系闹，说他是受江青迫害的。【笔者注：有据可查，牛辉林和“红旗飘”才是受江青直接迫害的。有目共睹，北大“井冈山兵团”则是间接受江青迫害的，施害者就是聂派。】

\*

\*

\*

1978年1月17日，校党委常委会开会，通报聂元梓要求周林转给邓副主席、华主席的信。聂在信中不承认自己有反周总理的罪行，也不承认与康生、“四人帮”有联系。会议决定：加强聂元梓的专案工作，由戈华挂帅，张学书具体负责，抓住主要问题进行清查。

【笔者注：“新北大公社”红卫兵跟踪追缉三个月，1967年12月3日，随踵而至，从昌平南口把戈华副校长抓回北大。戈华落入聂元梓手中，批斗数十场，打掉两颗牙齿、打断两根肋骨。现在聂元梓落入戈华为首的专案组手中，戈华可是连她一手指也没碰。这就是人性的较量，人性与兽性的区别。】

1978年1月25日，校党委向华主席、党中央报送《关于聂元梓问题的报告》，并附1977年12月6日聂元梓给华主席、邓副主席的一封信。报告提出，拟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批斗邓聂元梓大会，请中央批示。报告抄送北京市委和教育部。

1978年3月22日，上午9:55~10:35，邓小平约见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及北大的周林、高铁、韦民、汪小川，谈北大工作。邓问，北大的运动怎样？有人反映冷冷清清。邓问，聂元梓现在怎样？（周林答：他要翻案。）她有什么案可翻。聂元梓，为什么你们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

---

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康生说王八蛋也要支持嘛！邓副主席要北大搞出个样子，总要搞个经验出来。邓问道，周培源任命了没有？

1978年4月1日，北京市委批准把聂元梓、孙蓬一及打人凶手贺彦生三人隔离审查。

1978年4月6日，校党委常委会开会，提出运动的五条政策界限：（一）对于追随林彪、“四人帮”，参与聂、孙反党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和打人致死致残的凶手及幕后策划者、指挥者、组织者，这是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要严肃处理。

（二）对于那些残酷迫害干部、群众，搞刑讯、逼供、严刑拷打的首要分子及幕后指挥者，要让他们主动揭发交代，如果揭发交代得好，可以从宽处理。（三）对于一般打人的，主要是在运动中总结经验教训，肃清流毒，积极起来揭发，一般不予追究。（四）对于已经处理过，没有发现新问题又确有悔改表现、承认错误的，就不再处理。（五）点名（大会、大字报）要经过党委批准。

1978年4月8日，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对聂元梓审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将聂元梓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报告中附：（一）周培源1978年1月18日写的材料：1973年7月17日，毛主席接见杨政宁博士时，说“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二）李正里1978年1月19日写的材料：1971年5月19日，周总理接见美国高尔斯登和西格纳二位教授时，谈到北京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冲击教授等时说：“北大有个女人很坏，这些都是她搞的”。下午，校党委召开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大会由党委副书记高铁主持。中文系教员成美，经济系教员杨勋，生物系党总支书记胡寿文，西语系教员郑培蒂在会上发言，揭发聂、孙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的暴行。高铁在会上宣读了校党委为胡寿文、潘乃穉、杨勋、朱耆泉、陈信德平反的决定，并宣布了各系、各单位最近平反的35人的名单。

1978年4月19日，学校召开全校教职工员工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在会议上揭发、批判、控诉的有：华东师范大学代表夏鹤令，北大生物系毕业生、湖南临湘县572分校教员樊立勤，地质系教师王永法。校党委副书记韦明在会上宣布：经上级党委批准，决定开除聂元梓、孙蓬一的党籍，开除聂元梓、孙蓬一、贺彦生的公职，建议依法惩办。宣布后，当即由专政机关依法逮捕了聂元梓、孙蓬一、贺彦生。【笔者注：1978年又逢午马，聂元梓陵谷沧桑，这才叫“善恶有

报，天道好还”。这大概应了季羨林先生对贺剑城说的“谁种蒺藜刺谁”吧。】

1978年5月4日，北大举办“梁效”、王连龙、聂元梓罪证展览。

1978年9月1日，北大校党委召开全校落实党的政策大会，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及其代理人聂元梓、王连龙等人践踏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的罪行；推翻他们制造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错案和清队假经验，为受到诬陷打击的干部、教师、工人、学生昭雪平反。

1978年10月8日，北大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关于揭批和清算聂元梓一伙罪行的请示报告》。《报告》要求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聂元梓的罪行。《报告》同时抄报邓副主席和方毅副总理。

1978年12月，北京市召开批判聂元梓大会。

1979年8月29日，校党委向中央组织部陈野萍并胡耀邦报送有关孙蓬一是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康生和江青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主要助手的材料。胡耀邦做了批示后，学校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孙蓬一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复查核实，写出了上述材料。

1980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党中央决定开除康生、谢富治党籍》。党中央公布康生的大量罪行材料中，有一项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幕后策划下炮制的”。

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依法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3年7月13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孙蓬一有期徒刑十年。

1984年1月16日，校党委常委会开会，决定：同意开除高云鹏党籍。

## 结 语

聂元梓的“校文革”，是江青和中央文革一手扶植起来的，一直受江青和中央文革的直接统辖和强力支持。顾名思义，“校文革”就是专门在北大搞文革的。

老佛爷聂元梓是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树立的文革标杆人物，主掌北大这个“最高学府”，她德不配位、才不称任。在她被毛泽东撇弃之前，她就是一门心思搞文革的。为了集中地摹写她在北大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抽取拙作《北

---

大文革简史》涉及到“聂元梓”这个关键词的条目，依时间顺序，编成《北大文革“老佛爷”聂元梓》，以便读者阅读，以彰报施。要不然，聂元梓在当权两年，在北大，都干些什么，分头检索，很繁琐。

聂元梓在文革时期，除了紧跟江青、中央文革，充当“规定项目”的打手和马前卒，还完成了一系列“自选动作”：①先后向谢富治、康生密告安子文、邓觉先，致使安子文入狱，邓觉先、张振汉夫妻双双屈死于秦城监狱；②谋害亲夫，带领红卫兵抄丈夫吴溉之的家，率先加害老红军吴溉之，使之受迫害，于1968年含冤去世；③伙同孙蓬一、白晨曦等人抢先贴出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后来又指使麾下抓捕邓朴方，殴打、刑讯、逼供，致使其跳楼致残终身；④加害“社教左派战友”张侠、杨勋、孔繁、杨克明，致使杨勋锒铛入狱，张侠被谋杀身体伤残；⑤亲自操盘，组织炮打已经“投闲置散”的朱德委员长，影响极其恶劣；⑥指使麾下“八一兵团”到石家庄抄砸铁道兵司令部，绑架、批斗铁道兵政委崔田民，并致使大量档案材料损失；⑦落井下石，捏造事实，在校刊《新北大》发表大量攻击“杨余傅”文章；⑧“揪叛徒，反潘吴”、打常溪萍（致使其夫妻毙命、家破人亡），诬良为盗，株连无数，误导了“新北大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派”整个的“革命斗争大方向”；⑨“校文革筹委会”在国内率先建立“牛棚”，交由新北大公社掌控、运营至1969年春节，大面积批斗、迫害干部、教师、“黑帮”、“牛鬼蛇神”，强夺住房、鸡栖凤巢，扣发工资，停发助学金，直至绑架、殴打、刑讯逼供；⑩“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北京高校率先发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大规模冷兵器武斗，镇压反对派，断粮、断水、断电，丧心病狂，残杀无辜生命；杀人犯和充当刽子手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至今没有忏悔……

聂元梓在文革中的思想和行动，代表了民主、进步、人性？抑或是反民主、反人性、反动？笔者所见，聂元梓绝不反对文革，而是最积极的卖力文革、推进文革。罕譬而喻，“军机行走”王关戚因为不测的政治风云，遭到毛的抛弃。聂元梓何功可居？聂派赶紧编造一项“反王关戚”的桂冠戴在自己的头上。这绝对成为不了北大文革或者聂元梓的什么“亮点”，也绝对不成为北大文革的主流。现在对于某些北大人，批文革犹可、批聂元梓难。研究北大文革，大可不必“不念旧恶”，博取“气度恢弘”，还是一老一实，有什么说什么。

笔者对于北大文革更详尽的叙述，见拙作《北大文革简史》。



## 【争鸣】

## 聂元梓的手伸到华北局

樊能廷

## 一、聂元梓、白晨曦驾临华北局

《聂元梓回忆录》第195页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的时候，在北大搞军训的63军部队和学生一块儿出去夺。中央号召革命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号召军队要支持地方上的左派夺权。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夺，学生们到处跑着夺权，瞎跑了几夭，有跑到中央组织部的，有跑到华北局的，我也跟着上华北局去了。”

一说外出夺权，聂元梓雷厉风行，热血上冲，撸起袖子加油干。“学生们到处跑着夺权”，其实都是聂元梓指使的。学生们哪知道中央组织部是什么所在，华北局是什么所在，那里的权夺得夺不得？学生娃娃不知天高地厚，难道你聂元梓一个30年党龄的老干部也不懂？中央组织部、华北局，都是中共中央机构，能容得了你乱七八糟地去夺权？

这些，亲自领军外出夺权的聂元梓和白晨曦心里清清楚楚，她却说“我也跟着上华北局去了”，颠倒了她和学生之间的主从关系，到底是谁跟谁跑？她把重大的政治责任，轻轻巧巧地推到学生头上，够无赖！

中共中央华北局驻地在北京月坛北小街，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到北京新市委履任市委第一书记，向北大派出张承先工作组。北大工作组被中央文革赶跑，李雪峰犯了“路线错误”。聂元梓的姐姐聂元素在华北局工作，正好做聂元梓向华北局“夺权”的内应。

1967年1月19日，聂元梓派北大学生数十人到华北局。北大学生郑雄对华北局“一联总部”负责人王立邦说：“聂元梓同志说，这次夺权是中央安排的”。

晚上十一点，聂元梓、白晨曦联袂驾临华北局，检查、布置“夺权”工作。当夜，就开始了“夺权”行动。

这次“夺权”有如下几点，值得一说：

1. 聂元梓在华北局内部的依靠力量是“一联总部”。
2. 北大学生郑雄一伙人和“一联总部”秘密包围了正在开会的书记和部长们，

---

让他们“交权”，夺权者占领了电话总机，并企图强占机要局。他们声称，是中央让他们来夺权的。

3. 他们用重兵把守李雪峰的家，准备把李雪峰抓起来。

4. 在中央宣布“对华北局不能夺权”，责令北大学生立即撤出华北局以后，聂元梓坚持谎言惑众，说这次夺权，是中央指示的。

## 二、聂元梓与李雪峰结怨于“五·二五”

聂元梓一举成名于“五·二五”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批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6月1日之前的几天，“五·二五”大字报引起了波澜，惊动了上层。

聂元梓七人大字报是5月25日下午贴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的。

事情发生的当天，周恩来总理派中共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等来北大，于当夜12点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国务院有关文件，批评聂等的大字报不应贴在外面。张彦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说：大字报可以贴，但北大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并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认真遵守。李雪峰讲话更涵衍：“我们来了惊动了你们，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北大的党要把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有秩序、有领导。党内有民主集中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

李雪峰的讲话，对于大字报有褒有贬，明面上指示“北大的党要把运动领导好”，倡明领导权在党；说“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有秩序、有领导”，可以理解为骨子里批评大字报“无组织、无纪律、无秩序、无领导”，甚至是“乌合之众，乱七八糟”。

张彦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加上李雪峰举重若轻、口气绵和的讲话，其分量和味道，足够30年党龄的聂元梓掂量一些日子的。

## 三、聂元梓反攻倒算批判李雪峰

李雪峰向北大派出了张承先工作组，犯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从8月中旬起，实际上就“靠边站”了。张承先工作组在北大当了五十天的家，

李雪峰从华北局到北京市，也就当了五十天的家。

1966年7月27日，聂元梓按照江青的授意，向全校提出“民主选举校文革筹委会”的倡议。聂元梓经哲学系推选为代表。

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9月11日，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聂元梓为校文革主任，全盘接收了北大的党政财文权柄。

8月15日晚20时，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在工人体育场开十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珮云、张学书、谢道渊、王学珍等学校负责干部被揪上台陪斗。被斗和陪斗人一律挂黑牌。李雪峰、王任重参加了大会。

李雪峰因为犯了“路线错误”，9月份被停职。李雪峰一靠边，鼓破乱人捶，聂元梓的机会来了。她鼓动和组织的“批判李雪峰”，全面铺开，一浪高似一浪地开展起来。

10月29日，校文革召开大会，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日，《新北大》刊登哲学系一战斗队写的《李雪峰在5月25日的报告是反革命的报告》等批判文章。

11月1日，校文革集会，纪念“六·一”（聂元梓大字报由中央台播发之日）五周年，重头戏是继续批判李雪峰。

11月5日，《新北大》第20期，第一版转第二版，刊登本刊讯《十一月一日我校与外地来京串连的革命师生隆重集会，纪念毛主席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五周年，继续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雪峰同志向全体到会的革命师生做检查。他承认在前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中，以他为首的北京新市委贯彻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雪峰检查之后，大会发言进行批判。

第三版，刊登新北大“湘江”战斗队《李雪峰是镇压北大“六·一八”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两千字。

同期第三版，刊登新北大“海陆空”战斗队《李雪峰六月三日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是一株大毒草》。

同期第四版，刊登哲学系“灭资兴无”战斗队甘斗、陈红、王致钦、施毓麟《李雪峰的“六·二三”讲话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纲领》，四千余字。

1967年1月10日，《新北大》第25期，第一版，社论《乘胜追击，彻底粉

---

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罪行累累。贯穿着这条罪恶黑线的，是刘、邓→李雪峰、王任重→张承先等人，而孔繁、杨克明等人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

1967年初，中共中央调谢富治到北京市委，接替李雪峰的工作。上海带头，全国掀起“夺权风暴”。

就是在这个气候条件下，聂元梓亲自出马，去夺华北局的权，中央并没有解除李雪峰的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职务，聂元梓的华北局夺权，直截了当就是擅自下手夺李雪峰的权。

1967年2月4日，《新北大》第34期，第三版，刊登刘国政《孔、杨有罪，罪该万死》：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晚上，聂元梓同志发表了广播讲话，提出了“上揪下扫”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正确的，是代表了我校广大革命师生意志的。上揪，就是要揪李雪峰。可是孔繁先生，一听这个“上揪”，就十分恼火。我（刘国政）说：就是要揪李雪峰！李雪峰把我们历史系延安战斗队的二十多名同学打成了右派了，为什么不能揪他。结果也遭到了反对。李雪峰把历史系的同学打成右派，我们揪他是天经地义的革命壮举，不容任何人非难！后来孔繁先生给一个人打电话说：“他妈的，谁知道他们要搞什么鬼，要揪李雪峰了！”

#### 四、聂元梓反反复复四次派员在天津追击李雪峰

从1966年12月份，聂元梓与华北局群众组织“卫东队”（转年改称“一联总部”）建立联系，聂元素主动担任居间传话人。

1966年12月某一天，聂元素找机关“卫东队”负责人李炳和说：“聂元梓看了你们的大字报，说很好，她很关心你们。本来她想找你们谈谈，有事到上海去了。她回来以后，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从此，聂元梓同华北局“一联总部”之间，聂元素为桥梁，搭上了关系。

1967年1月初，机关“卫东”负责人李炳和、高才松等人，带着聂元素的介绍信去找聂元梓。聂元梓对他们说：“中央在什么情况下批转李雪峰的检查，我不了解。但可以肯定，中央是不保任何人的”，“你们对中央批转李雪峰的检查有意见，可以用战斗队的名义写抗议吗！”又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李雪峰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人留在党内是个隐患。我不打倒他，他会整我的。现在很需要你们向中央反映他的问题。”

聂元梓还煞有介事地说：“我们曾经派解放军记者和你们联系，没有联系上。”

“一联总部”成立后，李炳和、高才松等人向群众传达了聂元梓的意见，还忽悠群众说：“聂元梓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她代表中央文革接见我们。”这些话迷惑了很多群众。

1967年1月19日，聂元梓、白晨曦亲自出马，到华北局夺权，被中央制止。可是他们不肯死心，追打李雪峰的活动并没有停止。

1966年12月29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转了李雪峰12月16日的检查，中发（66）626号的批语：“李雪峰同志的检查是好的，诚恳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给大家参考”。也就是认可了李雪峰的检查。周恩来说：“从历史上看，雪峰同志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有缺点：繁琐哲学、讲话长。”不久，毛泽东又派李雪峰去天津组织大联合、夺权工作。

此际，聂元梓一拨又一拨地派人到天津去给李雪峰捣乱、添乱。历史系“延安战斗队”靳枫毅几十年后说：我们一趟一趟去天津，刷“打倒李雪峰”的大标语，以为聂元梓有“正确路线”，现在一看，就是给李雪峰干扰，捣乱、添堵、扯后腿。

李雪峰不会把聂元梓看在眼里，可她不一样，她公开给别人说：“我不打倒他，他会整我的。”按照“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的人生哲学，她要不遗余力地打倒李雪峰。

1月21日晚，聂元梓给李炳和打电话说：“夺权（指夺华北局的权）是完全正确的，大方向没有错。中央和中央文革对李雪峰的意见也不一致，康老、伯达同志是支持你们的，要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你们赶快整理材料报中央，这对统一中央的认识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聂元梓的电话，傍晚就在“一联总部”群众中进行了传达，在华北局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聂元素的腔调同聂元梓一模一样，她在群众中散布说：“康老、伯达同志是支持我们的，总理是保李雪峰的。”从此，在机关里刮起了一阵谣言风，说什么：“总理和中央文革对李雪峰的看法不一致。”

1月24日，李炳和、高才松等人去北大，带去“一联总部”起草的《李雪峰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材料。这个材料，是由聂元素提供了

---

一部分“素材”写成的，经过聂元梓审阅才最后定稿，决定报送中央。为了引起中央的重视，聂元梓让李炳和起草一封给中央的信附上。李炳和在信上原来上写道：“华北局的革命群众对李雪峰的检查有意见”，聂元梓看后让他改成：“对中央批转李雪峰的检查有意见”。这个材料，李炳和请聂元梓帮助印一两万份，聂元梓嫌印数太少，说要印十万、八万份，说：“交给我吧！你们不用管了，由我来定”。

1月28日，总理指示：“天津大局应该照顾。”1月31日总理指示：“天津形势很紧张，让雪峰同志去理出个头绪来。雪峰同志不能回来，是主席派他去的。伯达同志和我都很关心天津的问题。”

1月31日总理要接见“一联总部”代表的时候，李炳和、高才松就主张兵分两路，一路去见总理，一路去见中央文革，公开表示对总理不信任。后来，“一联总部”有人散布说：“总理是管行政的，送材料应该送给康生。周总理的话只能代表他个人。”而“一联总部”的成员甘东（行政十二级）等人竟然说：“中央有唱白脸的，有唱红脸的。”还有人说：“周总理是老保。”

2月7日、8日，总理指示：“现在天津任务很重，李雪峰同志还不能回来。”

2月10日，“一联总部”负责人李炳和、高才松等人去北大找聂元梓，打听中央对李雪峰同志的态度。聂元梓说：“中央保的名单中没有李雪峰，你们应该根据你们的材料去搞。”李炳和说：“我们正筹备召开斗争李雪峰的大会。”聂元梓说：“那好嘛！你们可以到北大来开，你们需要什么支援，我给你们支援。”

2月14日，天津驻军接管了天津公安局，在这个紧要关头，华北局“一联总部”跑到天津，介入了天津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派人去天津大肆煽动打倒李雪峰。

2月15日，总理再次指示：“李雪峰同志正在组织夺权，现在不能回来”。

聂元梓对总理的多次指示是知道的，但是她却坚决站在“一联总部”一边，积极支持和配合他们去破坏李雪峰在天津的工作。

2月下旬，聂元梓亲自派北大“延安战斗队”进驻华北局，配合“一联总部”揪斗李雪峰。聂元梓还根据聂元素的献策，派北大学生去天津，配合“一联总部”和天津（地方）的反李雪峰活动，大反李雪峰。

3月上旬，正值天津“夺权斗争”十分紧张的时刻，聂元梓对北大“延安”、

“红色清道夫”战斗队说：“李雪峰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打倒李雪峰没问题。”

3月7日，新北大公社红六团就在天津散发了《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雪峰宣战》的传单。三天之后，中央文革接待站去电话说，“现在不能在天津打李雪峰”，北大在天津的几个战斗队才撤回学校。

3月17日，群众组织召开大会斗争了梁寒冰（聂元梓的姐夫）。3月20日聂元梓就通过聂元素告诉“一联总部”负责人，让他们做准备一两天内去北大，说是向中央文革某某同志汇报。聂元素特别指名，让“一联总部”的操纵者樊策（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参加。

3月21日上午，聂元梓亲自打电话给樊策，让他和“一联总部”负责人立即来北大“汇报”。事后聂元素对樊策说：“聂元梓的意见，让你单独给中央文革汇报一次。”

3月中旬，听说天津正在筹划召开五个代表会，聂元梓又下了决心：“一定要打倒李雪峰”。她说：“一定要发动全北大的同学打倒李雪峰，还要和北京市高等院校串连，现在全国都有谭震林式的人物，天津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代表就是李雪峰。”蒙蔽全北大上上下下跟着她打倒李雪峰，使得北大的“反击二月逆流”别开生面。

于是聂元梓又派出“延安战斗队”、“红梅战斗队”、“红色清道夫”、“铁锤”等战斗队出马，由校文革负责人亲自布置，分兵四路：一路去天津，一路去山西，一路继续住华北局，一路在北京市活动。

3月14日，新北大公社红一团“缚苍龙战斗队”发表了《关于目前天津市文化大革命形势的严正声明》，说李雪峰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诋毁天津的大联合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小联合”。

3月19日，聂元梓在北大动员，说“李雪峰肯定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我们搞他不犯错误。”聂的这一个讲话，由新北大公社“延安战斗队”负责人向华北局“一联总部”做了传达。

聂元梓他们的这些活动，对天津起了破坏作用。中央文革知道后，对聂元梓说：“你们不要再揪李雪峰了。”北大校文革才又派车去把天津的学生接回北京。

没过几天，3月下旬，聂元梓听说天津即将夺权，再下决心打倒李雪峰。再

---

次派“延安”、“红色清道夫”、“红梅”等战斗队去天津活动。

4月4日，新北大公社政法大队“誓死卫东”战斗队发表了《揭穿李雪峰的一个大阴谋——告天津人民书》，谤诬天津的大联合是李雪峰玩弄的一个极端阴险、毒辣的反革命伎俩；谤诬天津驻军负责人是“打着‘支左’的招牌，疯狂蹂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一天新北大公社和新北大公社红卫兵，联名发表了题为《坚决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雪峰！》的严正声明，坚称“李雪峰肯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派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倒，彻底打倒。”

事后，聂元素向群众散布说：“这一声明，是中央秘密接见聂元梓后连夜起草的。”华北局“一联总部”也传达说：“聂元梓正在中央开会，接到陈伯达同志一个条子，聂元梓同志就当夜三点赶回北大，动员发一个打倒李雪峰的声明。”他们还说：“这次北大反李雪峰是有来头的。”

聂元梓家族和山西的刘贯一早有“深交”，有历史渊源。刘贯一和李雪峰互有嫌隙、格格不入，千方百计要对付李雪峰。所以聂元梓上台以后，因势乘便，把李雪峰拉到北大“批斗”，还利用手中校刊《新北大》这个舆论工具，公报私仇，不惜余力攻击陷害走了背字儿的李雪峰。

1967年4月25日聂元梓、聂元素到京西宾馆拜访山西来京的刘贯一，5月份刘贯一夫妇到聂元素、梁寒冰家里去过。刘贯一谈到打倒李雪峰问题，说：“不打乱中央毛主席的部署，打倒李雪峰问题是个时间问题。”

4月28日，“一联总部”为了对中央施加压力，煽动群众到李雪峰住宅静坐示威。30日，总理指示让他们撤出。他们继续静坐示威，还扬言要把队伍拉出去，找中央，进行斗争。聂元梓对“一联总部”的这些胡作非为，是支持的。

5月15日，“一联总部”在静坐示威骑虎难下的情况下，其负责人高才松等人去北大，对聂元梓说：“听说康老讲，李雪峰在乌兰夫问题上立了一大功。”聂元梓说：“中央不会保任何人，功是功，过是过，那只是在将来处理时应该考虑的。”当“一联总部”负责人说“我们在李雪峰家住了十多天，揪不到他。”聂元梓说：“你们揪不到他？他在北京住了这么长时间，要揪他怎么揪不到？”（按：提示就在北京揪李雪峰。）“你们是本机关的，当然可以揪他！”

5月18日，陈伯达严厉批评了“天工8·25”之后，聂元梓不但不叫住在“天工8·25”的北大学生返校，反而指使北大校文革负责人姜同光给（天津）



新北大公社负责人卢平打电话说：“考虑是否让他们(住在“天工8·25”的学生)发行校刊，给他们一个合法的身份活动。”继续支持“天工8·25”反李雪峰。

5月15日，“一联总部”的决策人李炳和等人到聂元梓家，聂元梓问道：“你们对梁寒冰怎么个看法？”李炳和等人回答说：“从现在搞的问题来看，很难说能够上什么分子。”聂元梓又说：“梁寒冰在师院被武斗了，你们知道不知道？”

总之，1967年上半年，聂元梓、孙蓬一、李清昆、姜同光、卢平、李士坤、赵正义、宋一秀，袞袞诸公，一直在擘画大略，组织校内力量、利用无知学生，联络华北局群众组织，穷追不舍，强击李雪峰。

由附件一：靳枫毅《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如何支配我们打李雪峰的？》、附件二：《1967年8月19日聂元梓在新北大公社形势串联会上讲话，华北局部分》、附件三：《李炳和：我和聂元素、聂元梓的关系》可以看得很清楚，聂元梓三番五次率领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缠斗李雪峰，臆必置其于死地。

### 五、揭开谎言看真相——“我们都是新北大公社的同志”

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第492页说：

说到我的其他事情，季羨林也有很多是弄错了的。他说我是新北大公社的头头，其实，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的头头。新北大公社有总部有委员，我没有参加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当主任。

本文的附件二，聂元梓1967年8月19日，在新北大公社形势串联会上讲话，明明白白地说道：他们要把我搞倒，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一个人算什么，他们把我搞臭是攻击……(停顿)我们的同志，攻击我们的事业，攻击我们大家所捍卫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办不到的。我现在出来讲这些是我不愿意的，是他们逼得我不得不说。说了只是为了维护党的事业。我向大家保证不再像任何人讲这些，我们都是新北大公社的同志，在这里讲一下，对于我的错误、缺点，希望大家批评，如江青同志讲的拍电影等……(掌声)，我诚恳地希望大家批评。

聂元梓在这里毫不含糊地说“我们都是新北大公社的同志”。所以，《聂元梓回忆录》中“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的说法，是撒谎，是掩盖历史真相。本文引用到聂元梓关于华北局讲话，顺便揭示她讲话中亲自承认的新北大公社身份。

---

## 六、聂元梓向华北局夺权，毛泽东在心里记着账

8341 部队军宣队郭宗林在《未名湖畔的记忆》第 13-14 页记述：

1968 年 11 月 21 日，为帮助聂元梓，宣传队组织了 600 人的会议，对聂元梓进行了再教育，对她的资产阶级立场，腐朽的两面派作风作严肃的批评。鉴于她的问题，宣传队在 11 月 12 日就给市委写了“关于聂元梓不能参加市委代表会的报告”，但未获批准。据新北大公社的负责人揭发说聂元梓当了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后，总嫌自己的权小，经常散布说还不如民主人士呢。由于对聂元梓的派性批斗不够，他们一派的气焰没有被彻底打下去，对不是自己一派的人，还在实行残酷斗争。

王连龙在讲话中，用事实批评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极左行为，这使得聂元梓一派非常不满，孙蓬一等人当场就想闹事，死抓住一些问题不放，说他们校文革是红色政权，拿着小本子念毛主席是支持他们的，他们听毛主席的话，听中央领导的话……，强烈叫嚣对王连龙代表宣传队所作的表态不服气。

8341 部队用简报把大会的情况和聂元梓一派的反应，反映给了毛主席，主席看过简报很生气，当即挥手说：小谢，你拿笔记，用你的话回去传达。毛主席这时站了起来，愤怒地说：“你老佛爷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的手都伸到汉中、伸到石家庄、伸到华北局了，不知道羞耻！你拿小本子压群众，念谁谁支持你，我支持你正确的，不支持你错误的。我叫你文斗，你搞武斗。你戴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你自称是红色政权，你是武斗文革、你是逼供信文革，派性文革。你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你斗是斗，搞武斗，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你们就是有黑的！你们说你们听我的，你们听了吗？我叫你们搞大联合，你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

……

归根到底，聂元梓种种倒行逆施以及野心勃发、僭越行事，三番五次伸手到华北局夺权，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在心里记着账呐。

### 附件一

## 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如何支配我们打李雪峰的？

靳枫毅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

《新北大井冈山通讯》第3期，第10-11页，1967年8月30日

二月末的一天深夜，聂元梓突然派人来叫我去燕南园66号。我一进屋，见李清昆在座，还有四个不相识的人。聂给我介绍说，这四位同志是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的，负责人叫李炳和。并说：“靳枫毅，你们延安战斗队是反李雪峰反得很有名的，今天有任务跟你商量一下。以后你们代表学校去跟华北局的同志（指在座的人）联系，一起搞李雪峰。”

当时我们早已将搞李雪峰的问题告一段落。聂元梓随手把一批材料交给了我，说：“这是华北局同志整理的，你熟悉一下。”李清昆在旁边说：“以后有什么事情跟我联系，有什么困难就说，校文革帮助解决。”

我立即组织队伍，分兵两路：一部分去华北局和革命造反联络总部配合作战；一部分速下天津去揪李雪峰。

我们去天津是三月五日。八日晚，孙蓬一打电话要我们回校。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回来问沈蓬一，他说现在不宜大张旗鼓地干。过了几天，新北大公社头头卢平来告诉我说：“聂元梓说，谢富治跟她说，李雪峰在中央会议上跟刘、邓一块攻击红卫兵运动，很坏。”接着又说：“这一回，李雪峰不是一个批判的问题，而是一个打倒的问题。”卢平下午还和我们商量的具体做法。这样我们又兵分四路干起来。（一）去山西调查；（二）去华北局联络；（三）再下天津揭李雪峰老底；（四）留校整理材料。

我们第二次去天津又没有搞下去。三月十二日去的，三月十六日又给叫了回来。当时主要是和天津驻军很矛盾。驻军支持李雪峰搞大联合。

记得回来以后，聂元梓还说我“很不聪明”。她说：“你看人家清华和北航的同学多聪明，悄悄地就把事情干好了。你可好，还没怎么样，我聂元梓就被人家抓住不放了。”还说：“我也不好老向中央文革反映李雪峰的问题，常说，人家会想我有私心杂念了。再说聂元素也在华北局工作。”（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到这会儿，才稍微有点明白了。

三月末的一天，凌晨两点，公社的卢平跑来把我叫起来，说：“快起来，打

---

倒李雪峰！”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问他，他也没说明白，只说：“公社决定发一个打倒李雪峰的声明，你快起草一个！快把你的人马上喊起来，刷大标语呀！”我想，见了孙蓬一再问吧，先干。于是第二天清晨，北大校园里焕然一新；清一色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雪峰的大标语。当天中午校广播台就广播了《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雪峰的严正声明》。

我们随即又派人第三次杀回天津去和李雪峰血战到底。

日后，问孙蓬一为什么这回下决心要打倒李雪峰？孙蓬一说：“我到中央文革开会去了，见了陈伯达，我就写了个条子，说群众搞李雪峰的呼声很高，递给他看。伯达看了以后，笑了笑说：‘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会意了，伯达同志不反对我们搞，是支持我们的。”

当时公社的头头们说：“现在师大搞谭震林、余秋里，咱们不了解情况，不能跟他们跑，跑来跑去搞不出什么名堂，还是自己另找新路！于是就找到了李雪峰。”此主张，亦即聂元梓、孙蓬一的主张。

## 附件二

### 聂元梓在新北大公社形势串联会上讲话，华北局部分

1967年8月19日上午

《新北大井冈山通讯》第3期，第23页，1967年8月30日

关于华北局问题，我和华北局“一联”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找我反映过情况，要同我们合作，我说要是去年还行，现在我们不搞了。李雪峰在我们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市委犯了错误，难道我们反他一下就犯了法吗？他们要我给转材料，我转了，这正如我给全国各地群众组织向上转材料一样，我作为一个左派，难道给群众反映情况也不可以吗？转了一些材料就说是黑手，是后台，我绝不能同意（十分激动）。

聂真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还有人来访问我，问是否聂真在旧华北局受刘澜涛等人的迫害，我说我不了解，只知道不重视他。

同志们提的是事实，我错了就接受批判，同志们不清楚的我就给解释清楚，如果无中生有，想把我抹黑，是绝对办不到的。

同陶王关系问题：就是大串联，我受了他的影响。其它问题没受他影响，对他们不了解。

彭小蒙想捣鬼是办不到的，那次有好多人在场嘛！

说抄吴溉之家的事情，牛辉林三番五次提，说揪出陶铸前四天我还去找陶铸，没这回事。我通过这事同安子文做了坚决斗争，揭露了他们里通外国，搞出了两部电台，此后中监委没作认真处理，进行包庇。我就要抄他的家。我向康生同志反映了，康生同志说：中组部、中监委由陶铸主管，故叫我去找陶铸，我这才去找陶铸。我一直没讲，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对得起党的，很长时间我连哲学系老左派我也没讲过，我认为做一点点事是应该的，不值得解释。我同我爱人离婚是为了坚持党的立场，这是一件好事，但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反而要给我抹黑呢？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

他们要把我搞倒，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一个人算什么，他们把我搞臭是攻击……（停顿）我们的同志，攻击我们的事业，攻击我们大家所捍卫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办不到的。我现在出来讲这些是我不愿意的，是他们逼得我不得不说。说了只是为了维护党的事业。我向大家保证不再像任何人讲这些，我们都是新北大公社的同志，在这里讲一下，对于我的错误、缺点，希望大家批评，如江青同志讲的拍电影等……（掌声），我诚恳地希望大家批评。

### 附件三

#### 李炳和《我和聂元素、聂元梓的关系》

《新北大井冈山通讯》第3期，第19-20页，1967年8月30日

##### 一、我和聂元素的关系

聂元素是聂元梓同志的姐姐，是三反分子梁寒冰的老婆。从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她根本不揭发梁寒冰的主要问题，和梁寒冰划不清界限，甚至上窜下跳，千方百计想给梁寒冰翻案。她是个政治大扒手。

在文化大革命前，我认识聂元素，但是她不认识我。他的作风装扮我很讨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七人于去年十一月下旬贴出一张揭发一个黑报告的大字报，并成立了机关“卫东战斗队”。以后，大约去年十二月的一天，聂元素到

---

“卫东”办公室找我们说：“聂元梓很关心你们的大字报，她本来想找你们谈谈，但有事到上海去了，她回来以后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她并说：“我在延安在康生、陈伯达手下工作多年，我和这些首长很熟。”由于她这样积极宣传，加之我们想通过她和聂元梓同志联系，想得到聂元梓同志的支持，因而在开始一段，就对聂元素的一些活动丧失了警惕。她千方百计想钻入我们的组织，曾提出要参加“卫东”。我当时只是推让她找宣传部“卫东”的同志谈谈。她写的《李雪峰对抗毛泽东思想五十五例》的大字报，我们也同意给她印了。二月初她还参加研究过当时“卫东队”负责人之一侯生哲同志的发言稿，并做过修改。她还散布过：“中央并没有明确保李雪峰”。“看来总理是保李雪峰的，陈伯达、康生同志是支持你们的。”进行煽动。我去过她家两次，一次是和于茂胜同志去的，主要是向她了解李雪峰和刘少奇、邓小平在太行时的关系（她写过这样一张大字报）。当时因她谈不出什么新东西，我们又有事，所以时间不长就走了。第二次是在一天晚上，已经九点多了，她给我打个电话，说有要事要到我家来。我当时考虑不想让她到我家来，我即说你不要来了，我去你家去吧。我去她家时，在座的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她和我讲：“聂元梓刚走，她进城开会去了，今天晚上回来一定要来，要带她孩子回去。你有什么事可以等等她，她回来好好谈谈。”当时已经太晚了，聂元梓同志又是刚走，开完会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当时我就不愿意等了。我推说：“我没有什么要事谈，有两份材料你交给她就行了。”我随手给他留下两份李雪峰的罪行录材料就走了。另外，在三月二十一日她又来找我一次，她说：“中央文革有一个同志我联系好了，她要在北大听取你们的汇报，可以让宣传部范×同志和你们一同去。”当时由我、高才松、于茂胜和范×同志去做一次汇报。据说范×同志的汇报主要是给梁寒冰和聂元素辩解的。从这次汇报的安排来看，聂元素所以这样积极活动，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梁寒冰翻案，保梁寒冰过关。从此以后，我们即和她断绝了关系。

## 二、我和聂元梓同志的关系

大约一月初，正是我们对李雪峰问题的性质还定不下来的时候。有一天聂元素对我们说：“聂元梓回来了，我告诉你们地址你们去和他谈谈。最好早晚去堵她，白天她不在家。”第二天一早六点左右我和高才松同志就在北大中关村宿舍找到了聂元梓同志。我们说是华北局的，她好像就很了解似的。我和高才松同

志给她讲了华北局运动情况以后，问她中央是在什么情况下批转李雪峰检查的，有无保他的意思，聂元梓同志说：“为什么批转他的检查我不了解，但中央不保任何人。”我们说他的检查送中央的和在机关的不一样，有好多问题没有检查是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的。聂元梓同志说：“你们可以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意见，还可以用你们战斗队的名义提出抗议，抗议李雪峰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我们说：“李雪峰的问题很多，他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我们认为他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聂元梓同志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这个人留在党内是个隐患。我不打倒他，他会整我的。现在我很需要你们向中央反映他的问题。”聂元梓同志还透露：“李雪峰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实际上早已经停止了。”因为聂元梓同志要去开会，所以我们谈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完了。（因为聂元梓同志不让记，所以全是大意）这次和聂元梓同志会见，对李雪峰问题的认识，起了定性的作用。以后我们给总理的两次汇报也是根据这个调子谈的。

一月十九日聂元梓同志派来北大六十多个同学要在华北局夺权。约在晚上十一点左右，聂元梓同志和白晨曦同志坐车来到华北局，找到当时负责来华北局夺权的北大同学郑旬（郑雄？）、周明礼，当时我也在座。我们向聂元梓同志汇报了夺权情况，并向他提出：夺权进展顺利，已经基本都控制了。现在有一个问题，北工大东方红提出我们的夺权路线上有问题，只是学生和干部，没有工人。聂元梓同志说：“中央也没有规定夺权非要有工人不行。”接着她就亲自给“首都职工红色造反联络总”站打了个电话，要他们来几个工人。然后聂元梓、白晨曦同志说要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去，他们就走了。后来中央文革来电话，不同意夺权，要北大同学撤出华北局。二十日，我们十三人到北大找聂元梓同志，想弄清中央为什么不让夺权，据北大同学们说，他们来华北局夺权是中央文革的意思。

当时聂元梓同志不在，由白晨曦同志接见我们。我们当时在北大还听周明礼同学说，中央常委对华北局问题认识不一致。当晚我们还给聂元梓同志打过电话，询问她夺权问题。聂元梓同志说：“去华北局夺权是根据总理十八日在人大大会堂讲话精神的，这次让撤出来是伯达同志的意思。你们材料整的怎样？陈伯达同志等你们的意见，你们现在应该帮助中央了解华北局问题。”

一月二十四日上午，我和高才松、李惠玲、王卫东（南开住华北局联络站负责人）到北大找到了聂元梓同志，他在六一楼接见了我们，我们带的《万言大

---

字报》稿两份。一份要求她转给中央文革，一份请她帮助铅印。聂元梓同志看了一下说：“太多了，中央首长看不了，你们不写信？”当时我们几个商量，由我执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大意是：伯达、康生、江青同志：李雪峰的检查是欺骗中央、欺骗毛主席的，我们对他的检查有意见，现在将我们整理的李雪峰同志的材料送上，请收阅。我们请求中央首长接见我们，或派人来和我们谈谈。落款是联络总部。信写好后，聂元梓看了一下说：“你们只写对他的检查有意见，不能引起中央的重视，因为现在群众对干部的检查都是有意见的，你们应该加一句：‘我们对中央批转李雪峰的检查也有意见。’”我们根据聂元梓同志的意见加上了这句话，又写了一遍交给了她。我们走出楼以后就将另一份交给聂元梓同志，请他帮助铅印。她当时问印多少？我们说印一、二万份，她说铅印一次才印一、两万份？我们又说，印上四、五万份也可以，她最后说“我定罢”，拿上就走了。

在二月初，为了筹备批斗李雪峰大会，在一天晚上，我和高才松、刘明、×××同志又次到北大找聂元梓同志，她在六一楼楼上和李清昆同志接见了我们。我们简单和她谈了华北局运动以后，问她中央是不是在保李雪峰，中央没有个明确态度我们感到很不好办。聂元梓同志说“中央保的名单中没有李雪峰，你们现在主要应根据李雪峰的问题和你们的机关的实际情况去搞。”我们说正在筹备批斗李雪峰大会，聂元梓同志说：“那好么！你们可以来北大来开。我给你们介绍个战斗队，你们以后可以和他们联系。”当时由李清昆同志给历史系“延安战斗队”靳枫毅同志打电话，聂元梓就走了。靳来以后我们简单接了一下头就走了。

五月十五日，正在总部进驻李公馆，骑虎难下，李雪峰去向也不明，我们感到没法进行时，我和高才松、于茂胜又一次去找了聂元梓同志，在她家里谈的。我们首先问李雪峰的下落，聂元梓同志说：“听说李雪峰到内蒙去了。”我们问她：“听说康生同志讲话谈到李雪峰在揭发乌兰夫问题上立了一大功。”聂元梓同志说：“中央不会保任何一个人的错误，功是功，错误是错误，那只是在将来处理时要考虑的。”我们说总部进驻李公馆快二十天了，李雪峰揪不住。聂元梓同志说：“你们到他家还能揪住他？他在北京住了那么长的时间，要揪他怎么还揪不住？”我们问他北大为什么不搞李雪峰了？聂元梓同志说：“中央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们搞就搞到社会上去了。你们是本机关的，当然可以搞他。”最后她问：



“你们对梁寒冰怎么个看法？”

我们说我们对梁寒冰问题不了解，他的主要问题听说是在天津。聂元梓同志说：“梁寒冰在师大武斗了，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们说不知道，梁寒冰的问题从现在揭发的材料来看，很难说他够上什么分子，他的主要问题是看他和×张有无关联。

聂元梓同志没说什么，我们就走了。这次谈话后，我们认为聂元梓同志不应该问梁寒冰的问题，我们给她谈的问题也不恰当。聂元梓同志可能有私心，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找过她。

以上是我和聂元素、聂元梓全部接触过程和所谈的问题。我这次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坚持要打倒李雪峰。主要是我的思想深处没有毛泽东思想，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立场站错了。但是聂元梓同志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她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主席支持，她又是大专院校红代会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中央负责同志接触多，一定是领会中央意图的，所以我们对聂元梓同志是很信任的，对她的话是很相信的。🔒

【评论】

## 简评樊能廷的《聂元梓的手伸向华北局》

王复兴

—

此篇樊文写了关于北大文革与华北局运动的关系。虽然北大文革与华北局运动相互交叉、影响并不大，北大师生介入华北局运动也并不深。在北大文革进程中，属于发生在校外的重大事件中与华北局有关的事件排不上号，例如不像1967年1月的高教部夺权事件中北大与北师大谭厚兰的冲突或4月8日在民族宫北大与地院东方红的冲突事件那样，对北大文革运动、北京高校的运动曾产生重大影响。而华北局的事情则不然，不值得费力气地大书特书。樊文之所以写此长文并罗列许多当年“材料”，主要是出于派性，为了抹黑对立派的领导聂元梓。樊文有一特点，行文充满了派性与攻击性语句，有许多不实之词，例如：题目中说聂

---

“手伸向华北局”，想把聂描绘成野心家。说什么聂和新北大公社去华北局的师生是：“够无赖”、“谎言惑众”、“乌合之众”。这类言词在樊文中比比皆是。本来华北局、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与北大文革运动的关系完全可以恰当地反映，从中反映北大师生当年在 50 天内反工作组、批资反路线的一个侧面，这对回顾北大文革史具有一定意义，但把这个题目引向派性叙述与论说，就很难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历史了。

## 二

当年北大一部分师生、干部反李雪峰，主要背景是：1966 年 5 月，516 通知宣布彭真被打倒，而后李雪峰被中共中央委派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一上任便于 6 月 1 日派出全国、全北京第一支进驻高校和中学的工作组进入北大。工作组组长是李雪峰的下属、华北局文教书记张承先。因此 7 月底工作组被毛泽东批评为镇压群众运动之后，北大跟着反工作组、批资反路线的风，兴起一股揪、批李雪峰的风潮。到 10 月初北大第一次分裂时，两派都揪李，批李。包括后来北大井冈山兵团的骨干“北京公社”，当时也“揪李”、“批李”。当时有少数师生跑到华北局，“上揪”李雪峰，批判其资反路线。当时北大这股批判华北局李雪峰的风潮，与地院东方红四进地质部，揪批原工作组组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甚至上揪地质部部长何长工；以及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在工作组撤走后继续批判原工作组组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并批斗王光美，以上三例，同属一个潮流。是北京高校反工作组斗争的延续，是批判资反路线的大潮。北大当时上揪李雪峰，批判其资反路线，师生、广部普遍认为是正确的。聂在北大领着此潮流跑，这没什么奇怪的，虽然今天看来是错误行为，但也并非特别的罪行。当时的政治形势如此，当年批工作组，批资反路线是正确的大方向，全国如此。樊说聂伸手华北局要夺权，是夸大其词渲染说聂有野心。而且是毛号召一月夺权，北大师生去华北局夺权也是响应号召而已，后来中央文革说“华北局的权不能夺。”北大师生就自然地撤了。

客观、真实地描述当年聂元梓、北大两派师生到华北局批李，有助于认识当年工作组与北大师生的矛盾，有助于理解从十七年到五十天的官民矛盾，有助于理解、研究 1966 年 10 月至 12 月全国炮轰、造反大潮的史实。樊文提供了这方

面的许多新鲜史料，有一定的价值，他完全可以从正面进行描述并深入分析，但可惜了，为了抹黑对立派，樊文走歪了路，指控聂元梓：“擅自下手夺李雪峰的权”，“蒙蔽全北大上上下下跟着她打倒李雪峰。”又说聂，“总之，1967年上半年，利用无知的学生”去打倒李雪峰。这类论述都欠客观，偏离了真相。

### 三

聂元梓、北大部分师生于1967年1月后到华北局夺权，是错误的行动。从樊文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于1967年发动一月夺权风暴的随意性及其所造成巨大社会混乱。樊文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些素材，可惜该文未循此路径进行阐述、分析，而是把重心放在抹黑对立派上。

1967年1月初，上海《文汇报》被造反派夺权，揭开了所谓“一月风暴”的序幕。1月4日，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6日，张春桥、姚文元等借全市各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市府领导人。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权力落到张、姚等人手里。毛泽东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于1月8日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取代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1月8日，毛泽东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8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此处中共中央把走资派与“坚持资反路线的顽固分子”画了等号，那么，什么是“坚持资反路线的顽固分子”呢？这是指那些上千上万的50天内担任工作组的负责人，只要群众认为检查不好，就是“顽固分子”，于是打击面一下子扩大了，打击目

---

标、夺权目标也更明晰了：反工作组，批资反路线，直接上升、演变为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应特别指出的是，被毛泽东高度赞扬和支持的上海造反派在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之同时，也夺了华东局的权，打倒了兼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

从此，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大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

毛号召全国自下而上夺权。谁去夺？怎么夺？夺权的合法性由谁批准？有何规则？那些权可夺？而那些中央机构的权不能夺？新政权如何运作？这些全无说明，一个号召，一哄而起。领袖头脑一热，心血来潮，拍拍脑袋，想起什么是毛在全国掀起夺权风暴，有着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当年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尚须排兵布阵，由中央规定：先打那；后打那；那里围而不打；那里割而不围；各野战军如何配合；后勤如何跟进。总之有周详计划、严格规定。这下可好，政治大战役比军事战役复杂得多，中央却没什么说法，无任何规则，就是一个最高指示吹下去，于是全国开始乱夺权。

1月18日，周恩来、中央文革接见首都工矿企业代表、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代表，周恩来讲，“我们要把夺权斗争汇成一个总的运动。”“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夺权中要下大力量。”这次接见，北大校友李清崑老师参加了，他亲自听到以上总理的讲话，向笔者证实确有此事。新北大到高教部夺权，夺了一大堆印章，放在校文革委员徐运朴的办公室，以为这就是夺了权。当时也有为数不多的北大师生去华北局夺权，后来中央文革又说“对华北局的权不能夺。”意思这是中央的权，不能夺。可是为什么不在夺权开始时就规定、讲明？为什么上海的造反派夺了华东局的权不算犯规？中央不是号召全国的造反派向上海学习吗？

#### 四

北大学生去华北局揪李雪峰，批其资反路线，最突出的是历史系延安战斗队，队长是靳枫毅。樊在文中多次提到历史系这个战斗队，但出于派性，有意没说清楚这个战斗队的事情。延安战斗队去华北局造反，并不是什么“由聂孙支配”。“支配”之说源于延安战斗队队长靳枫毅1967年六月三十日（这时靳枫毅已脱离新北大公社，成为校文革对立派井冈山的骨干）写的材料（附于樊文后），说

他们延安战斗队去华北局揭批李雪峰是“受聂、孙支配”，此话不实。樊没有深入考证，纠正此不实之说，反而就此发挥。实事是，当年靳枫毅等同学上揪李雪峰，主要是出于他们本身的主动性，是内因起了决定性作用。根源是历史系三年级这批学生在工作组时期的遭遇。因为他们三年级一批学生（靳枫毅等人）挨了工作组整。李雪峰女儿、历史系三年级学生李丹林是站在工作组一边的，且后来在6月底、7月初北大辩论工作组问题时，李丹林带领一些干部子弟公开贴出大字报保工作组。工作组撤走后，历史系延安战斗队上揪李丹林老爸李雪峰，劲头特大。正如樊文引用校文革委员、历史系学生刘国政所言：“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晚上，聂元梓同志发表了广播讲话，提出了‘上揪下扫’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正确的，是代表了我校广大革命师生意志的。上揪，就是要揪李雪峰。可是孔繁先生，一听这个‘上揪’，就十分恼火。我（刘国政）说：就是要揪李雪峰！李雪峰把我们历史系延安战斗队的二十多名同学打成了右派了，为什么不能揪他。结果也遭到了反对。李雪峰把历史系的同学打成右派，我们揪他是天经地义的革命壮举，不容任何人非难！”（据1967年2月4日，《新北大》第34期，第三版，刘国政文章）。樊文提到的这件史料挺珍贵，延安战斗队的此事完全可以详细述说并正面描述。但樊却回避了内情。因为延安战斗队后来在北大第二次分裂时（1967年6月5日之后），延安战斗队脱离了新北大公社，成了井冈山有名的战斗队，队长靳枫毅一度成为井冈山总部勤务员之一。对此，樊为什么不交待清楚？这是为了抹黑聂元梓介入华北局运动，于是便掩盖了靳枫毅的派别身份，以免抹黑本派，这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 五

笔者与许多校友有同感，很不喜欢樊的文风，他的行文对当年不同派别的师生，充满攻击性，似乎还没走出文革，且讲述历史真真假假混在一起。例如第七页讲到1967年3月下旬有一段话，写道：“于是聂元梓又派出，延安战斗队、红梅战斗队、红色清道夫、铁锤等战斗队出马，由校文革负责人亲自布置，分兵四路：一路去天津，一路去山西，一路继续住华北局，一路在北京市活动。”笔者本人是红梅战斗队的，一眼看出其虚假之处，1967年3月，我们红梅战斗队整个3月呆在北大，根本没去外地，一直在学校内。且红梅战斗队在文革中从未介入华北局运动，也没去过华北局，也没贴过李雪峰的大字报。

---

樊文信口开河，偏离事实，不止一处，他在第八页写道：“没过几天，3月下旬，聂元梓听说天津即将夺权，再下决心打倒李雪峰。再次派‘延安’、‘红色清道夫’、‘红梅’等战斗队去天津活动。”由于笔者是当事人，又一眼就认出了樊的不实之言。我们“红梅战斗队”不但1967年3月下旬没去过天津，而且在整个文革期间也没去过天津串连。他的以上描述从何而来呢？

以上仅是两个涉及笔者的例子，其他地方还有何处不实？不是当事人的一般读者可能很难分辨。因此我对樊文的可信度，十分缺乏信心。

2019年8月26日

【述往】

##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

——工宣队与大联合（21）

陆伟国

回到学校，果不其然，大学生活要结束了。不但，大学生生活要结束了，大学的红卫兵、大学的群众组织也都自行消散，甚至连人民大学自己也没有了。

为结束已经完全失控的校园局势，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又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校。工宣队的任务，如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最高指示所说：“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7月27日，数万名工宣队员在解放军的配合下，突然开进清华大学。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这样大的事情，竟然事先没有说明和告知，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意识地中止和蒯大富的联系。结果，清华的“井冈山”在情况不明之下进行武装抵抗，双方发生大规模冲突，死了五个工宣队员。这是要用工宣队员的命，来堵学生组织的嘴。把人都打死了，你们什么也不用说了，就是那么回事了，听从发落已经是便宜你们了。

28日凌晨，毛泽东亲自出面，召见了北京高校的那“五大造反领袖”。从别处后赶来的清华的蒯大富哭诉，遭到了工人的镇压。毛极其严厉地说，你要抓黑手，那个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们犯

错误的时候了，我再说一遍，如果谁再不听劝告，谁就是国民党，谁就是土匪，就歼灭！说完这话，毛泽东头也不回地走进另一间屋去了。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还两次提到了人民大学。这个放在后面讲。

“五大领袖”瘫软在沙发上。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说了句：“完了，完了，红卫兵完了。”

蹦跶了两年的高校红卫兵，顷刻之间就被淘汰出局，而且再无翻身的机会。它的使命和活动，就此结束。（在这之后的几年里，中学还有红卫兵，但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意思，只相当于先前的共青团。文件上正式宣布不再用红卫兵的名称，那已是文革结束之后了。以上事件，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中学红卫兵实际上只兴旺了几个月，1967年初取缔联动之后，就不起作用了。其实，尽管当时还是利用清华的蒯大富那派去八一学校冲击联动，但在那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就已经不信任北京高校的所谓“五大领袖”的红卫兵造反派了。据2013年《炎黄春秋》第4期朱维铮的口述文章“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讲，1967年3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恢复《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专门用来探听、收集北京高校红卫兵造反派、尤其是“五大领袖”的负面材料直接报送毛办和周办。而这些人蹦跶到这时才如梦方醒。

最近，我看网上的《记忆》杂志有文章追究在工宣队进清华那天，蒯大富有没有在清华，上哪儿去了，何时走何时回，讨论得很细很认真。其实，不管蒯大富那天干什么，他和那五大领袖以及北京乃至全国高校的群众组织被赶下历史舞台的结局，已经被毛泽东定下了。毛泽东的政治手腕再一次得到显露。就像运动一开始，不管刘少奇派不派工作组，都逃脱不了被打击的命运。此时，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最早的造反派开始被抛弃、被镇压。曾经的壮怀激烈、叱咤风云，顷刻之间就变成了凄凄惨惨戚戚。文革中演出了多少这样的一幕。

8月22日，工宣队进驻人民大学。来者，是以人民机械厂为主。那天，我们在校门口外迎接工宣队的到来，两派分列在路的两边。我看到了一年多没见面的那一派的上海老乡张庆明和朱荣庆同学就站在路对面。众目睽睽之下，我还离开自己的队伍穿过马路，走了过去，到了他们那一边，多少感慨一言难尽，笑谈了几分钟后又再走回来。过了两天，有人问我，你第一天就消除派性啦？其实，

---

我本来就没有派性，不存在消除的问题。

那时工宣队列队走到哪儿，队伍的最前面必定有一个人摆出很神圣的样子双手捧着个玻璃框，里面装的是芒果的仿制品，后面才是一大帮表情严肃的人。那芒果本是一个外国友人送给毛泽东的礼品，他又在8月5日转送给了清华工宣队。这可成了了不得的圣物。甚至有传言，那芒果一千年才结一个果啊。其实，那时市场价也就不到一元钱一斤。要真是一千年结一个果，它也决不可能繁衍生存下来。现代迷信，由此可见一斑。

想起1966年6月，学校的文革也是以派驻工作组开始。这还作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而大批特批。1966年9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在讲到人民大学问题时特地讲了：“再发社论告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出处前面已有）两年多后，却又以工人宣传队的方式派了工作组，作为高校文革的收场，也是很有讽刺意味的。这不就是像那副对联说的：“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说他行，他就行，不行也行”。工宣队进校之后，便开始了“斗批改”。对于人民大学来说，则是“斗批散”，连学校也解散了。

其实，人民大学的被撤销，并非没有预兆。就在工宣队进来的前几天，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在此文的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里就把文科的高校基本排除在外了。

人虽然是渐渐地住到一起。可是两派积怨已深，愤恨难平，一下子就要“联合”，谈何容易。果然有些人还不肯泄气，继续在挑动事端。可能是因为我们班的“三红”小组长张春同学被“新人大”抓去打过，“三红”这一面的就要反过来抓我们班“新人大”的报复。尽管工宣队已进校掌管大权，“三红”的一些人却依然要抓人。

因为对方的同学已陆续搬回原宿舍，反而更好抓一些。名单都定好了，先是要抓许昭忠同学。我们班“三红”的柏承庆同学不知怎么得知了这个情况，出于同学情份，十分着急，通过朱婉珍同学设法转告了过去。许同学闻讯赶紧避开，



得以逃过一劫。在“新人大”同学回到东风三楼没几天，我方“三红”依然抓走了我们班“新人大”的另一位同学，即我们的班长李原好。在李同学回东风三楼不久，一个晚上，已九点多，他被三四个蒙面人从床上拖走，两手被绳子捆住，头被蒙上衣服，拖到了“三红”总部的新教学楼地下室。

到了那儿，眼睛被换成黑布蒙上，就立即遭到审讯毒打。边问：“你为什么参加‘新人大’不参加‘三红’？你为什么保郭影秋反对孙泱？”李原好不回答就打耳光，打得他两眼冒金花，鼻子、嘴角都流出了血。打人者又喝道，要他跪下，他不肯。上来一个人猛踢一脚，击中右腿，当即就造成骨裂脱臼。李同学“啊”的一声惨叫摔倒在地，打人者还不放过，又接连几个小时的皮带抽、棍子打，一直打到深夜一点多。这时的李同学只能躺在地上呻吟，脸上阵阵抽搐，浑身遍体鳞伤。一天一夜没吃没喝，屎尿都拉在身上，尤其是被木棍猛砸的右腿撕心裂肺的疼痛，还留下了后遗症，至今行走不便。虽然是被蒙了眼睛，能听得出当时在里面被抓去挨打的“新人大”同学还有好几个。

事后知道，我们班被抓去的还有黄金藻同学。抓他的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和曾经被抓去挨打的“三红”同学张春一样，毕业之后的几十年里都不太愿意和其他同学联系，对他后来的情况也了解不多。

在“新人大”同学的努力下，解放军、工人宣队主持正义，对“三红”的这部分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在第二天下午李原好被放出。此时的他浑身伤痛、两眼看不见东西，已无法行走，是一位解放军同志把他背了出来，上了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同班的二位“新人大”女同学陪同前去，而且在之后的几十天里，对李同学精心照料。在这时又一次显示出人性的光芒，同学之情，如同手足。但造成的右腿骨裂脱臼却落下了病根，至今每到冬天和阴雨天，还是酸痛难忍。

这事在当时我并不知情。事隔几十年之后，李原好同学才告诉了我详情。而那位许昭忠同学不久前还几次对我说，他至今还十分感谢柏承庆同学的冒险转告。

工宣队进校后的最要紧的事，就是主持两派的大联合。而作为像我这种一般群众，也无所谓联合不联合。坐在一起讨论学习就是了。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就表面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怨恨。再说对这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早就看透了，过腻了。说要“联合”，也没有多大抵触，也能坐到一起。

---

班里面第一次重新开会，是在学生食堂旁边的排球场上，依然是每人一个马扎，围着圈坐。形势那么乱，这小马扎倒是都没丢。同学间也没什么对抗的情绪。先是工宣队的人讲话，不讲，我们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几个同学，包括我，接着发了言，一致表态要摈弃派性，相互间掌声一响，相逢一笑，也就过去了。其实，这些年的灾难伤痛，该怪谁呢？能怪自己班里的同学么？这不是明摆的事么，大家也是想得开的，这个疙瘩就比较好解。早就看穿了、想穿了，所谓的“联合”也就是那么回事。

工宣队来后，对文革中的一些事件，也没有给说法。但两派的头就没有舒服日子了。两年后，他们有的去了江西接受审查。那些群众组织的头，包括北京高校所谓“天派”、“地派”的头，能够“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已经是格外开恩了。那个在文革造反活动中，鞍前马后、不遗余力的清华的蒯大富，文革后被判了17年。这些挺有能耐的文革弄潮儿，却被文革大大地忽悠了一番。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忽悠。不过，最近看他的回忆文章，他对文革、对自己的经历，还是没有充分的认识。

所谓“大联合”，说穿了，也就是对文革中盛极一时的各类群众组织没有宣布解散的解散。各级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都已建立，旧有的行政体系已被彻底摧毁，被极左势力用来当作夺权工具的各种群众组织，不管它革命不革命，当然都不再需要，都当成破鞋一样被毫不留情地扔掉。

对人大两派组织的任何一方，我都不想偏袒和辩护。而且在本书中，没有秘闻和内幕，也没有揭发和检举，只是讲了对极左势力的愤怒和控诉，只是讲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一些事，不过是现在很少有人讲罢了。我觉得有必要讲给今天的年轻人听听这段荒唐的、渗着血泪的、足够我们民族记取千百年教训的历史。仅此而已。

那时，工宣队有的人，也想应点时景，搞点“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些，但是很少有人响应，也就不搞了。尽管极左横行、社会混乱到那种程度，但这一套在人民大学还是搞不起来。我是一次也没参加。人大的内在精神还在。对于工宣队来说，也没过多地操办这些，心想早点把这帮学生弄走算了。🔴

## 【文摘】

**教科书一般的人生经历：聂元梓的九十八年**

老田

在过去一百年内，中国经历了变革幅度最大的历史震荡，恰好，聂元梓都作为亲历者参与其中了。正是从个人与历史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她教科书一般的人生。

毫无疑问，聂元梓最初亲历的是中国的革命岁月，作为具有爱国情怀的青年学生，她参与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新中国成为高级别干部。这是她人生中间第一个重要时间段。在回忆录中，她追述了自己参加革命队伍的经过，在那个“北平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她走向了抗日。

1935年国民党与日寇签署“何梅协定”之后，党国的军警宪特退到保定以南，深怀抗日热情的青年学生大多对国民党政权绝望了，希望有一个真的打日本的力量可以加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大批青年学生撤出平津寻找抗日道路。正是这个时候，中共完成了长征到了北方，在平汉铁路各站，共产党人摆上一张木头桌子，派出人员招募抗日青年从军。据聂元梓回忆，最初与她接洽招募事务的是程子华，而与聂元梓一道受招募的三位小伙伴，都十分看重这个被招募的机会，唯恐被扔下了，几乎到了要紧跟盯人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聂元梓作为高级干部，亲历官场的蜕化变质，她自己第一次不幸婚姻，就源于小三追求“大干部”。她作为女性，首次从这样的视角，深切地体验到了革命第二天的一般性问题。在她的第二次短暂婚姻中间，她被带到了共产党最高层官员的生活圈子，目睹了中组部长的交往圈子及其腐朽生活，她对此的反感是不言而喻的，还从阶级斗争和特嫌角度向康生汇报了自己的发现。

在1964年开始的北大社教运动中间，她受到工作组的启发和动员，起来揭露北大官场的问题，就此被官场打入另册，1965年两次国际饭店会议中间备受打击和批判。到了文革前夕，北大官场已经预备把聂元梓放逐农村，驱离北大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她看到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精神，同时也预备做一次鱼死网破的抗争，这才是她参与那张著名的“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

---

在共产党人的政治传统中间，群众路线和批判与自我批评，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同时也是一个对传统政治生活的巨大颠覆。这样的政治实践是一个打开封闭政治空间的革命性举措，是极大地缓和政治不平等以及权力封闭性的革新，传统的等级关系以及下级依附并服从上级的政治关系，相当大程度被缓和了。上级垄断权力和决策机会的封闭性，相当程度打开了，下级或者群众可以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或者诉求，参与决策过程和权力运作过程，甚至还可以对上级进行周期性的“反批评”（整风），这个变革，我称之为“私人领域公共化”。

在根据地年代，私人领域公共化的革新措施，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长官的尊重，因为没有下级和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切都玩不转。但是，到了执政之后，长官一个人垄断机会分配同时经营小圈子，就成了官场风气。北大官场一样如此，即便是上级派来的工作组，想要了解一些真实情况，也不得不深入动员和拉拢“积极分子”，北大官场此种小圈子经营带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状况，甚为普遍；而工作组为了打开局面，也不得不费心费力去经营另外一个小圈子。以第二个小圈子去揭示第一个小圈子的问题，这个恰好说明官场的真实状态。

在革命后年月，革命年代的私人领域公共化趋势，被逐步终结，官场的小圈子封闭程度加深，“跟人而不是跟路线”成为聪明人的首选，宁可犯政治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成为官场铁律，正是依据这一的新标准，聂元梓才被认定为“异己分子”和不可靠力量，成为需要彻底放逐的人。在文革后，聂元梓这一段经历被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坏事，但是，从中国革命的旧传统和共产党人的明示规则来说，聂元梓的说法很对。但是，做得对的，为什么反而吃不开，这才是文革所揭示的根本性问题所在。

北大“四清”的反复，工作组动员的积极分子，面临着被反攻倒算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各路人马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表现。象聂元梓这样，不愿意后退与妥协的是一批人，除了她之后还孙蓬一、郭罗基等人。也有人及时地转弯子，想要重归旧章，再找好一个位置坐回去，例如著名的季羨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间，没有清晰讲述她在两次国际饭店会议中间受到那么大压力，为什么还继续拒绝退步。看起来，聂元梓作为女性革命者和高干，早已经有了对于官场的潜在批判意识，她之所以成为工作组的积极分子，后来又拒绝后退以保全自己，应该说这是她愿意遵从的“本心”——她自己对于官场的批判是

内在的而非外在的。以至于被陆平等入彻底划为“界外”预备放逐她下农村去，她依然没有选择后退和求饶，而是在文革初期参与署名第一张大字报，这原本是要选择一次“殊死反抗”，很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在这个问题上，聂元梓身上确实存在着继续革命的内在动力，或者潜意识里已经有了想要终结官场腐朽黑暗面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她才坚定地选择向前。

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聂元梓回忆说自己也极感意外，她追述当时的感受是“脑袋发懵”——自己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件事肯定对她有利，把她从极端不利的状况下解放出来了，这一点倒是清楚的。

正是因为此种力度的支持和宣传，聂元梓有了一笔在无意之间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所以，她后来在新北大校文革中间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那些在国际饭店会议中间不妥协的积极分子，现在近乎有了英雄的地位，成为人们称赞和膜拜的对象。但在另外一个方面，那些在国际饭店中间妥协过的人，对照下来，则近乎有了“当叛徒”的不光彩，从这样的心理出发，就需要彻底抹黑和打压聂元梓的需要。就这样，著名的季羨林先生参加了对立派“井冈山”，说他们自己才是“更造反”“更革命”的一方，直到1990年代季羨林书写的回忆录的里面，依然象泼妇骂街那样恶毒咒诅聂元梓和她们那一派，却没有讲出为何如此的道理。

文革大潮兴起之后，每一个人都在重新找寻自己的位置，同时也想办法以损害他人位置为条件去提升自己。在这样的恶性政治竞争中间，聂元梓缺乏把控能力，也未能在需要她发挥正面引导作用的时候，起到相应的作用。虽然被合称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但是，这些领袖们确实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领导责任。北大和清华，作为全国著名学府都陷入恶性政治竞争，以至于最后升级到武斗。在两派的辩论中间，每一派都竭尽全力抹黑对立派，各种语言暴力有增无已，1968年毛老人家在接见五大领袖时，用开玩笑的口气复述了北大两派的辩论策略：井冈山一派说聂元梓哥哥姐姐都不是好人所以她也不好，而新北大一派提出“杀牛、宰猴、断羊腰”。据谢静宜回忆，毛爷爷私下里对北大清华的状况极端不满意，措辞更是相当刻薄，甚至有“不知羞耻”的字眼。

应该说，北大和清华走到两派尖锐对立和武斗的地步，业已形成了难于共存的僵局，毛在接见时开玩笑说要不“斗批走”“斗批散”、北大、清华都一分为二，两派各自组成一所大学算了。此种严重状况实际上已经预示了“利维坦”的

---

迫切需要，以及造反派从现实政治中间出局的后果。正是在同一次接见中，周总理、康生等人开始狠批造反派组织的“北航黑会”，这预示着未能够完成基本政治整合、实现团结大多数的造反派力量，已经被视为恢复秩序的负面力量了。

今天回顾，北大和清华的那种状况出现，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应付和解决的，聂元梓当时有着较高地位，却未能对此作出改变，因此，领导能力不足的判断是成立的。至于文革后说聂元梓就是原发性的破坏力量，则迹近胡说。


在文革后，“做得对的吃不开”的趋势，更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所以，聂元梓作为坏人在宣传和定性中间就变得更坏了。但是，这个诱发文革参与者的强烈批判意识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

聂元梓一生的坎坷曲折，促成了她对官场的朴素批判性，文革期间就此获得标杆地位，由此也带来她后半生的牢狱之灾。“从事于道者，道亦乐得之。”聂元梓早期参加革命，中期对官场的怀疑，晚期受到打压，这些曲折的经历，均与中国革命的原初追求密切相关。一个人也许不是刻意地追求继续革命的，但是，人生际遇如此需要她做出明确选择与抗争的时候，她依据自己的际遇和经验也选择了，然后，她就活成了那个与革命初心无法相互离弃的样子。

如果聂元梓真的预见性地认识到她选择的一切，有能力把控她遭遇到的各种状况，事后能够准确定位自己曾经的处境和大格局，那她就可以与毛泽东那样的革命战略家相比了，会成为芸芸众生中间的例外，她人生经历和思考的代表性，反而会因此降低不少。

文革虽然被彻底否定了，但是聂元梓看到了的官场黑暗面，以及她付出过极大代价批判过的腐朽状况，都依然存在着，并且更加严重了。在组织及权力普遍化的现代社会中间，聂元梓曾经的处境和遭遇到的困境，恰好也是我们大多数人日常面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聂元梓的人生及其曲折，都依然是人类进步阶梯上必不可少的一环，她的付出和牺牲依然是有价值的，会得到后人的公正评价。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聂老的一生及其牺牲，都是作为战士而付出的代价，她的努力和曲折，都将会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

愿聂老安息!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 【资料】

**北大文化革命又处在关键时刻****——兼评聂元梓同志八月五日的广播讲话**

经济系 杨勋（1966.10.6）

9月19日我写了《致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委员的公开信》。在那封信中，我提到了当前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带有根本路线性的问题，半个月过去了，至今没有看到校革委会的任何反映，现在我仍然认为，如果不认真解决那些问题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四个多月来，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曲折发展的。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了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但是，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实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镇压了北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在那个关键时刻，毛主席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支持北大的革命派，搬掉了张承先工作组这个障碍物，在推翻了张承先工作组的反动统治以后，北大重新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好革命形势。当时校文革筹委会如果能放手发动群众，乘东风，大破张承先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立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路线，就有可能使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健康地迅猛地向前发展。可惜事情不是这样。

两个多月来，北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十六条的指引下觉悟空前提高，思想大大解放，在各项工作中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做出来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校筹委会和校革委指导思想上的严重错误，致使北大的运动没有真正深入地开展起来。

两个多月来，校筹委会和校革委在清除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斗黑帮、选举、串联、接待等项工作中，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校筹委会和校革委做了不少热热闹闹的表面工作，但真正触及灵魂的实实在在的工作做得很少很差，全校运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有些单位的运动甚至离开了文化革命的大方向，走上了邪路。

对于当前北大运动的这种严重落后状况，广大革命群众早已极为不满，他们

---

迫切要求打破北大的沉闷空气，改变这种冷落的局面。

但是，也有一些人十分欣赏这种死气沉沉的“平稳”状态，满足于运动的现状，甚至自以为北大的运动现在还是走在兄弟院校的前面。其实，这不过是盲目的自我陶醉而已！

对于校筹委和校革委的种种错误，广大革命群众从八月中旬以来，就不断地提出了许多尖锐批评和宝贵意见。但是，校筹委和校文革没有认真对待这些批评和意见，采取了不理不采的官僚主义态度，甚至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压制和打击。两个多月来，校筹委和校文革日益走向机关化、行政化和官僚化，逐渐丧失其作为文化革命运动中的群众组织的特色，越来越脱离了大多数革命群众。

为什么在张承先工作组撤走以后北大的运动仍然处于落后的状态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校筹委和校文革没有真正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执行了一条右倾保守的改良主义的错误路线。

在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问题上，从始至终存在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斗争。张承先工作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突出的典型。在张承先工作组撤走以后，校筹委并没有按照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张承先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清除这条反动路线对北大运动的影响，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校筹委采取了走过场的作法，结果，直到现在，张承先右倾机会主义阴魂仍然顽固地附着在一些人的身上，张承先工作组统治时期的一些错误做法，经过改头换面，继续被保留下来，一些曾经遭受张承先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好同志至今没有得到解放，一些被张承先工作组欺骗、利用的好同志至今没有真正觉醒。这就是两个多月来北大文化革命运动不能健康深入开展的根源所在。

在进一步分析这个错误根源时，人们不能不想到聂元梓同志在担任筹委会主任之后所作的一次重要的广播讲话。八月五日，聂元梓同志代表筹委会做了《对当前工作的几点建议》的广播讲话。这是一个具有方向性错误的讲话，它给北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埋下了病根。在这个讲话中，聂元梓同志虽然也引用了一些革命词句，但它的基础是右倾保守的，改良主义的，折衷主义的，调和主义的，7月底到8月初，聂元梓同志所作的关于张承先工作组问题的其它几次讲话和她在筹委会上的多次发言，其基调也是如此，错误甚至更明显。



这里我不打算全面剖析这个讲话，而仅就其中的某些内容进行简略的评论。

聂元梓在这个讲话中说：“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借着清理工作组错误的机会，想把真正的革命左派（指某些追随过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同志——引者注）一棍子打死。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必须与这种错误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聂元梓同志把这种个别现象当成了当时的主要危险。并向全校师生员工大声疾呼，要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斗争”。

难道聂元梓同志要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那种现象真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吗？不是，绝对不是！当时的主要危险是许多人害怕清理，抵制清理，从而有可能使清理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走过场。对于这个真正的主要危险，聂元梓同志在讲话中不仅没有加以强调，提醒大家注意防止，相反，她还给清理工作规定了不少的框框，限制对张承先错误的清理。

在这个讲话中，聂元梓同志说：“筹委会号召全体北大的师生员工，要顾大体，识大局，加强团结，一致对敌，决不能斤斤计较内部分析，而忘记了主要打击目标，使运动迷失方向，走向邪路。”很明显，聂元梓同志是想用折衷主义、调和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张承先工作组的错误所引起的严重分歧，她大讲团结，而绝口不谈达到团结一致的前提（分清是非）和方法（批评或斗争）。在当时清理工作还没有认真开展起来的情况下，讲这样一些话，是完全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也是违背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分清是非、加强团结的指示的。既然当时的主要分歧是由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引起的，因此，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就必须首先弄清在张承先工作组问题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不弄清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一致对敌”。

聂元梓同志8月5日的广播讲话给当时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泼了一瓢冷水，广大革命群众要求彻底清算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积极性被压下去了。在同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得不到承认。一些曾经被张承先工作组压制和迫害的同志，在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解放了十天之后，又重新背上了包袱。一些积极抵制过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坚决要求彻底清算这条反动路线的同志，受到了非难、指责和攻击。个别跟张承先跟得很紧、思想意识严重不纯的人，在没有吸取教训的情况下，继续在文化革命组织中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从而阻碍运动的健康发展。总

---

之，聂元梓同志的8月5日的讲话以后，由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重新发动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又逐渐冷却了下去。

聂元梓同志8月5日的讲话，是一个很重要的讲话。两个多月来，校筹委和校革委会的工作大体上是在这个讲话的基本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此，认真研究和分析这个讲话，对于从根本上认识两个多月来北大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聂元梓同志的这个讲话，校筹委会曾进行过讨论，在讨论时，我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没有被采纳。8月4日晚，在批判张承先的万人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给张承先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作了结论，在大会结束之前，我再一次建议聂元梓同志根据大会上康生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的精神修改广播讲话的内容，但没有被采纳，由于我坚持要彻底清算张承先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北大运动的影响，并揭发了经济系工作组在张承先的指挥下把经四一部分同学错误地打成牛鬼蛇神的严重罪行，从八月初开始，我被当作“假左派”，并遭到了将近两个月的有组织有领导的围攻。这场围攻在校文革选举前夕达到了最高潮，因为有人一心要把我从校文革组织中排挤出去。在校文革选举期间有人以“杨勋是什么人”为题写了长篇大字报，论证“以聂元梓为首的正确路线战胜了以杨勋为首的错误路线”。校筹委会常委委员×××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说：经济系杨勋是假左派，校筹委派人把她搞下去。校文革常委委员×××由于同意我8月23日大字报的观点，在选校文革委员和常委委员时竟遭到追查，质问他同杨勋有什么关系。

两个多月过去了。斗争陆平、彭珮云的大会开了若干次，校文革也选出来了，展览会也办起来了，论战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也没有了，从表面上看似乎北大的运动一切都令人满意了，北大好像真的成了向其他单位传授先进经验的“橱窗”了。但是，北大的运动究竟搞得怎么样呢？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吗？校文革选举真的符合十六条中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吗？运动真正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了吗？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形成了吗？

两个多月过去了。由张承先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矛盾解决了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北大运动的影响清除了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彻底贯彻了吗？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矛盾是不能掩盖也不能调和的。革命者决不能害怕矛盾，回避矛盾。革命者的责任在于：正确地认识和解决革命运动中不断出现的各种矛盾。

《红旗》第13期社论指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

为了彻底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北大运动的影响，排除阻力，改变北大运动的落后局面，胜利地完成斗、批、改的任务，目前有必要就北大文化革命运动的根本路线问题展开一场大辩论。

我们希望校文革和聂元梓同志立即行动起来积极组织这场大辩论。


关心北大文化大革命命运的同志们，让我们勇敢地投入这场大辩论吧！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倒奴隶主义！

打倒折衷主义！

坚决执行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1966.10.6（载于1966年10月8日《新北大》第三版）

## 【资料】

# 要彻底革命，不要改良派

## 一、辩论的实质

这场大辩论，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伟大号召下开展起来的，好得很！北京大学在张承先走后，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斗争，其表现形式就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斗争。

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范围内，主要表现形式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但是这决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唯一表现形式，北大的文革经过两次夺权，较之其他许多单位，已经处于一种新的阶段上，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上，就是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了更隐蔽更精致的形式，

---

即改良主义。现在，这场大辩论的实质，就是广大革命师生运用毛泽东思想运用十六条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无情的批判，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投入这场战斗。

## 二、校文革是改良派

以聶元梓同志为首的校筹委——革委两个多月来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聶元梓同志对张承先路线是缺乏认识的，她在哲学系领导文化大革命时期，基本上执行了张承先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聶元梓十九日晚对哲学系的讲话，是在她知道了李雪峰同志已经严厉地批评了张承先之后，然而在这个讲话中，她也只提到，张承先的主要错误是不斗陆平，而对“六·一八”这个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事件中，却只字不提，对陈必陶大字报也未肯定，没有认识到张承先错误路线的实质。

她不懂得与张承先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生死决战，而满足于搬走了张承先个人。因此，张承先走后，她刚一上台，在八月五日，就以改良主义的面目出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执行康生、江青同志关于批倒批臭张承先的重要指示，压制和停止了对张承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使当时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群众性的大批判流产了，结果北大搬到了张承先工作组，又换上了聶元梓“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本质上还是张承先路线，只是形式上改头换面，更难于辨认了一些罢了。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普及毛泽东思想，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但是，校毛著学习宣传组却整天忙于开书单，订空头计划，搞花架子，甚至弄虚作假，关起门来捏造经验，鼓励了假学假用。他们不蹲点，不树标兵，不是活的思想第一，不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校文革常委对师生员工的活思想若明若暗，对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毫不重视。常委会从不开会研究这个问题。这就决定了他们根本不能领导好这场文化大革命，不可能真正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真正贯彻十六条。

第二，他们患了和张承先相同的病症，“怕”字当头、害怕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严重脱离群众，不走群众路线。他们不是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而是拼命地把群众拉向自己设计的改良主义的框框中去。他们

害怕群众起来革命以至不让群众起来革命，这是他们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足点。

第三，不彻底解放在张承先路线统治时期受压制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其结果扼杀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他们继承张承先路线的一个明显标志。

第四，不抓阶级斗争，文革上台以后抛出的六条建议，一条也没有提阶级斗争。大小报告作了十几个，没有一个分析过北大阶级斗争形势。不鼓励甚至压制群众起来揭盖子，清查黑线，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认为，北大的阶级斗争盖子至今还没有彻底揭开，基本停留在社教运动和“国际饭店”时期的水平上。陆平黑帮统治下受压抑、受打击、受迫害的革命群众，有相当一部分人现在还没有解放。校筹委——革委不支持他们起来革命，他们仍不敢说话。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校筹委——革委在这里起了“铁盖子”的作用。

第五，对待斗争陆平黑帮，与张承先也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依然沿用那种旧的斗争形式，依然只依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在那里搞，让广大群众只作呐喊军、助威军。所谓打人民战争，触及灵魂，只是纸上谈兵，形式主义。他们满足过去，老吃社教运动和国际饭店的剩饭。张承先走后，两个月过去了，有什么新进展？群众越斗越没劲，而有些黑帮分子却越斗越嚣张。

第六，对红卫兵、革命串联这样的新生事物，不敏感、不觉察。出来以后，他们只是一心一意关起门来搞样板主义。

第七，自吹自擂实行了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按十六条办事。校系文革许多候选人的名单，不是经过革命群众的充分酝酿提出的，更没有再反复讨论，就匆忙投票，急于选出一个班子来。许多单位压制民主。在北大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充分揭开的情况下进行选举，势必有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遭到压抑，其结果，一大批“怕”字当头，闯劲不足、不偏不倚的人被推上了台，怎能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八，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阶级队伍，把以前的左派固定化（其中有许多人固步自封、不求进取、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不按十六条办事，不去发现左派，对运动中涌现出的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新左派，不予承认，彻底革命派上不来。有许多单位，除了几个固定化的左派以外，左中右不分明，仍

---

然是糊里糊涂一锅粥。

两个月来的革命实践证明，以你聂元梓为首的校筹委——革委，害怕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更不敢引火烧身，不能领导群众前进。群众要革命，他们要改良，极大地阻碍了群众运动。毛主席说：“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他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校文革就是执行了这样一条“怕”字当头的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北大文化大革命面临半途而废的危险！如果这条改良主义路线继续统治北大，势必斗也斗不下去，批也批不下去，改也改不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北大来。不要多久，修正主义就又会北大复辟。

### 三、历史根源

现在的文革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的当权派，基本上是以哲学系左派为核心。

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哲学系左派，与陆平黑帮进行了长期的顽强的斗争。在整风社教运动中，他们首先向陆平黑帮发起了攻击，在国际饭店的黑帮大反扑中，他们没有屈服，斗争到底。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在党中央“五·一六”通知指导和鼓舞下，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坚决支持，由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阶段。可见，在黑暗的旧北大，在于陆平黑帮的一场阶级搏斗中，聂元梓等同志建立了功勋，不愧是坚强的革命左派。那么，这样一些左派同志为什么在领导我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改良主义错误呢？这有客观原因，北大有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但也有这些左派同志的主观原因。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后者。

哲学系聂元梓等左派同志与陆平黑帮的斗争，主要限于陆平黑帮的干部路线和阶级路线，这是社教运动的斗争中心，也是国际饭店会议斗争的主要内容。至于对陆平黑帮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是这条路线的受害者和执行者。他们对这条路线不是坚决抵制和斗争，而是习惯于这条路线。他们在自己的办学和教学实践中，也基本上贯彻了陆平黑帮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至在他们当权的哲学系，同样也是一个典型的杂家讲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大泛滥，哲学系同样也是一块丢掉了的教育阵地，在教育战线上同样也是一面白旗。

哲学系聂元梓等左派同志，与陆平黑帮在干部路线和阶级路线的斗争也是不

彻底的。他们比较限于对上的斗争，而在他们当权的哲学系的学生干部问题上和建党问题上，他们同样没有真正贯彻党的阶级路线。

哲学系聂元梓等左派同志与陆平黑帮的斗争，是完全脱离广大学生群众的孤立的斗争。他们有一种很坏很坏的习气，就是惯于在各种工作中不走群众路线，严重脱离群众。这是他们斗争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是他们没有在自己当权的哲学系与陆平黑帮争夺群众争夺接班人的一个重要表现。

聂元梓等左派领导同志过去在哲学系的工作中，也是不抓毛著学习，不突出政治、很不注意抓政治思想教育的。这一点，哲学系同学都有目共睹，感受至深。对于冯定这样一个明目张胆的大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也很不敏感，长期没有觉察。虽然在十三陵会议上有所斗争，但是冯定不是哲学系左派同志首先揪出来的。

凡此种种，都是聂元梓等左派同志的一些致命弱点。但他们对此至今没有什么认识，他们太陶醉于自己过去取得的成绩，太居功了。他们被荣誉的包袱沉重地压着，不去正视问题。这些弱点没有消除，在他们领导这场极其深刻的文化大革命的现在，就发展得非常尖锐。由于他们过去工作中就不突出政治，不抓毛著学习，所以现在也如此；由于他们过去就对陆平黑帮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缺乏认识，所以现在他们对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也很不理解，领导很不得力；由于他们过去就严重脱离群众，所以现在他们在这场需要最充分地放手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中，仍然不走群众路线，不相信群众，不听取群众的意见，甚至压制群众。所有这些，决定了他们现在革命的不彻底性，这就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改良主义路线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当前，形势发展一日千里，革命激流中进行着新陈代谢，聂元梓等一些前一个革命阶段上的革命左派，今天已经成了改良派。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负责，对革命同志的真心爱护，我们不能不如实地尖锐地指出这一点。

#### 四、什么人才能够领导文化大革命

当前我校关于两条路线的大辩论，绝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我校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对于这场大辩论，对于这场两条路线的大搏斗，革命同志切切不可等闲视之！在这场大辩论中，首当其冲的是校、系文革的核心领导人物，特别是哲学系的左派领导人物。这场大辩论，已经并将更有力地触及他们灵魂的深处，这对他们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

在哲学系左派这批领导人物中，确实有一些同志很危险。他们热心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固步自封。他们比起我校那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无名小卒，那些敢闯敢造反的小将，在政治思想水平上，落后了一大截。他们过去，现在都患着一种顽症，就是脱离群众，害怕群众。他们还往往从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到压制群众、反对群众。在这里，我们十分诚恳地希望这些同志能正视自己的错误，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切实烧掉“怕”字，深入群众，虚心体察情况，善于发现左派，坚决依靠革命左派，争取中间派，彻底孤立反动的右派，从而得到群众的拥护。这些同志，如果继续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就不能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甚至成为被群众踢开的绊脚石。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忘记政权，就是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方向，失掉重心。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必然是争夺领导权。


当着北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落在那些害怕群众、害怕丢掉自己荣誉，丧失自己的权威，不求进去，小心翼翼的改良派手中时，我校文化大革命就一定会被拉向右转，引入歧途，甚至会把革命前途葬送。而当北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放在那些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敢于冲决“罗网”的“狂飙”式的人物，那些无所畏惧的彻底革命派，毛主席的好学生手中，我校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能朝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踏平万顷波涛，奋勇前进！

我们要大喊大叫：我们要“敢”字当头的革命闯将、真正的彻底革命派领导文化大革命！我们不要“怕”字当头，不求进取的政治庸人领导文化大革命！我们要彻底革命，不要改良派！

我们坚信：用毛泽东思想作为灵魂的新北大的航船，必将战胜惊涛骇浪，达到胜利的彼岸！

同志！举起你的双手，新北大是我们的！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哲《风雷激》战斗队 十月十二日

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总部翻印 1966年10月27日



【本刊声明】

##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方惜辰